



内部资料

国际财经评论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Business

2020 年·夏

重启全球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研究院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产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6 月《国际财经评论》(内刊)



公众微信号

地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楼 934 办公室

邮 编：100089

联系人：金玉洁

联系方式：010-8881 8121

传真：010-8881 0062

收稿邮箱：g20@bfsu.edu.cn

jinyujie@bfsu.edu.cn

网站：g20.bfsu.edu.cn

目录

财经论丛

第一章 从“中国企业”到“全球性企业”：中国海外企业打造身份认同的话语策略	4
第二章 股指期货对中国股市影响分析	7
第三章 货币互换协议助力中国进出口贸易复苏.....	10
第四章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新兴市场动荡对全球金融经济的影响.....	14

理论探索_Toc54683745

第五章 后疫情时代国际高等教育产业重启的机遇与挑战.....	19
第六章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及应对.....	29
第七章 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38
第八章 新时期欧盟贸易政策发展趋势.....	53
第九章 重启全球化——埃及经济增长的新机遇.....	65
第十章 美国工厂——关于美国梦、中产阶级消亡和工会中的中美文化冲突	74

第一章 从“中国企业”到“全球性企业”：中国海外企业打造身份认同的话语策略

任杰¹

近日，英国发布华为禁令，宣布将在 2027 年之前彻底移除其 5G 网络中的华为设备。据日本媒体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表示，美方可能会在禁用华为 5G 设备行动中提供财政支持。这不由让人回想起 2013 年，时任华为美国公司外部事务副总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在纽约的一场公开讲话：“华为在美国遇到的大量的挑战都是地缘政治层面的，这远远超出了企业（的界限）……我们 70% 的业务都在中国以外的市场，我们应当被认为是一家全球性企业而不是中国企业。”



华为英国总部

来源：《卫报》

此次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与逐渐泛滥的“逆全球化”思潮相互交织，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过程中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企业身份泛政治化、企业形象不友好、文化不兼容等诸多挑战。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跨国企业的表现依然亮眼。据 CNBC 7 月 29 日报道，在海外销量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华为超越三星成为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厂商。另外，虽然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导致 TikTok（抖音国际版）在海外各大应用市场相继被下架，但之前 TikTok 在海外市场采用的深度本土化和“淡色中国”策略获得了良好的商业反响。截至 4 月 30 日，TikTok 全球总下载已经达到了 20 亿次，疫情开始后的 5 个月内增加了 5 亿次下载量。再如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 Yandex (YNDX.US) 在美俄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在美股发展势头良好，可见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非常复杂，并非简单因果的零和博弈。全球化并不会

¹ 任杰，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跨国语言管理和语言服务。（北京，100083）

在疫情中消亡，反而会加速转型，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是无限机遇和全新挑战。面对外界诸多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应尽量避免介入地缘政治冲突，建立独立的全球性企业形象，将对话议题拉回商业框架内。对地缘政治冲突采取开放态度而非对立，更多关注企业自身竞争力和身份构建，加强公众对“全球性企业”的身份认同。

中国海外企业打造“全球性企业”身份认同的三类话语策略：

1. 突出用户话语属性

始终以用户为中心，打造企业与用户之间双向交互、平等均衡的“新型对话模式”和话语体系。融入当地文化，采用深度本地化原则，构建与当地文化一致的符号和意义系统，用当地公众便于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开展有效沟通，基于数字化技术建立更加平等互信的新型对话关系，充分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企业与目标用户之间的数据连接、场景连接、价值连接和心理连接。TikTok 在疫情期间获得巨大成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用户使用逻辑和场景的深度契合以及与年轻用户的心理连接，成为他们化解现实恐惧的避风港。

2. 多角度讲好中国企业故事

中国企业应当充分认识到促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就是促进世界对企业自身的理解。因此，要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借势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对话空间，结合企业故事，进行积极的对话与沟通，促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及中国企业的理解与支持。美通社相关调研显示，有两类故事最能够激发受众的认同感：一是“可能改变所在地群众生活方式和市场形态”的故事；二是“有意思的故事”。因此，在企业叙事方式上，要从单一刻板到复杂多元，因为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是在复杂性中找寻自己的认同感。在叙事内容上，要讲好中国企业创业故事、品牌故事、营销故事、投资故事、项目故事、合作共赢故事、社会责任故事等，以小见大，提高中国和中国企业文化价值观的国际认同感。

3. 多渠道发布海外社会责任报告

美通社 2018 年发布的首部《中国企业海外传播白皮书》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新闻发布的主题相对集中在“新产品 / 服务”和“参展信息”，分别占对外新闻总量的 28% 与 24%，而“社会责任”只占到了 2%，“环境相关”仅占 0.3%。中国企业在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公益慈善责任与法律责任方面与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对话不足，应在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注重加强更为多元形式的对话与传播，加强对当地法律的准确解读与相关风险预判。主动发布海外社会责任报告或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设置海外专题，突破传统文字图表的形式，运用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展现社会责任建设情况，借助镜头叙述海外责任担当。在语

言上采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提高报告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传播力。“一带一路”中国企业可采用多语种如中文、英文和目标国语言发布报告。在渠道上构建“多语种官网+多媒体平台”的传播矩阵，扩大海外传播覆盖度，多元化塑造企业海外形象。

第二章 股指期货对中国股市影响分析

胡震²

2010年4月16日股指期货在我国金融市场首次推出,股指期货的推出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证券市场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市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而投资者投资回报率却依然很低,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先行的股票单边机制损害了散户的利益,降低了他们的获利空间。

一、股指期货推出的重要意义

股指期货,全称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是指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标的物的金融期货合约,是买卖双方约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日期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交易某一股票指数的点数而达成的契约。股指期货与股权分置改革同样重要,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一次革命性的改革。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不光需要一个近期的价格还需要有一个远期的价格,这个远期价格就是期货。股指期货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是以金融衍生工作的身份进入的,那么它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能够发挥规避风险、价格发现机制等功能。

股指期货与沪深指数价格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三种情况:1、同时发生变化,这说明了期货市场对影响股票市场的信息做出了同样的反映;2、股票现货指数价格变化领先于股指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动,这种情况反映了股票现货的价格代表了一些可以影响到期货价格的信息,股票现货指数的变化影响期货的定价;3、股指期货市场价格变化领先于股票现货指数价格变化,股指期货对与股票现货价格的信息反应速度快于股票现货指数,这种情况体现了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

股指期货作为上个世纪末的金融创新,它的推出改变了商品期货的历史,连接了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改变了过去这两个市场互相分割的状态,在投资理念和操作思路上的互相借鉴,完善交易机制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股指期货提供的做空机制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之前我国股票市场只能单边做多的割据,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资产配置以及套期保值等方面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推出将会推进我国金融衍生品乃至资本市场的发展迈向新的阶段。

二、当前沪深股市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形成了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中国特色道路,

² 胡震,湖北省鄂州市文星路三六五金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邮编:436000, E-mail : hz1961@163.com

证券市场不断扩大，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投资者参与度不断提高，制度建设日趋完善。但证券市场在诸多方面的不完善表现依然很明显，存在着过度投机的问题，放大和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和风险，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严重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能力弱，稳定性较差，股票价格容易暴涨暴跌，市盈率畸高。这些问题限制了股市融资、宏观调控、合理配置资源和价格发现功能，将会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我国股票市场当前存在这诸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如下：

当前我国股市的做空机制工具有限，门槛较高。我国从 2010 年开始，我国的股票市场逐步建立了融资融券制度和股指期货制度，打破了之前只能单边做多的格局限制，为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由于融资融券业务的标的股有限，不可能推广到所有的股票，且限制条件颇多，并不适合广大的中小投资者操作；而股指期货由于业务门槛较高，保证金额度较大将绝大多数的中小投资者挡在了门外。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的多空机制，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风险对冲手段，是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客观问题。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缺乏联系。我国市场机制不够成熟是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缺乏联系的必然原因。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阶段，直接由计划经济阶段直接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市场机制在发展种不断摸索不断建设，存在着发展不成熟的情况。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做法、制度不可避免的会对股票市场这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的产物产生不利影响。而我国股票市场又是国企融资需求和政府催生下的产物，其融资功能受到过分关注，导致我国股市的功能定位和股票发现制度不合理。国企为上市而改制，筹集自己是其最终目的，改制只是手段，改制后上市的公司经验机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在市场机制下，其经营业绩不佳几乎成了必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手段不多，除了从银行贷款和直接获取发行资格而获得直接融资以外，没有更多的融资手段，进一步加剧了融资能力的弱化，以上诸点导致了我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直接出现脱节。

过度投机。股市的暴涨暴跌导致严重泡沫化现象促使股市投机盛行，正是由于过度投机导致高换手率使得股市处于严重超买状态，从而出现了高市盈率，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世界各国主要证券市场的换手率各不相同，相差甚远，相比之下，中国股市的换手率位于各国前列。中小投资者缺乏投资方面的知识和相应的能力加剧了过度投机，一般而言，在成熟的股票市场，交易者对于股价走势有不同的看法，其不同的交易行为能够减缓股价的波动。而我国股票市场建设较晚，其中不少中心投资者缺乏相关的金融、证券方面的知识以及相应的分析、决策的能力，赌博和暴富的心理较强，在股票交易过程中听小道消息、股评，从而

出现盲目跟风、追涨杀跌，进一步加剧了股市的投机氛围；机构投资者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了投机行为，我国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为了遏制投机行为，但是，这些为了遏制投机而培育的机构投资者不少反过来反而成为了投机炒作的主要力量，机构投资者参与短线炒作情况屡见不鲜，使得我国股市的投机氛围更加浓厚。

发行制度存在弊病。现在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中真正优良的公司不多，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我们的发现制度存在问题。首先，对上市公司的上市把关不严，其次，审计太过马虎，还有发行方式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发行市盈率不公平，一会高，一会低，就是同一支股票股票发行的市盈率都存在不同；2、发行方式不公平，大机构自己雄厚，在场外大量申购后到二级市场欺骗中小投资者进行抛售，给中小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

三、股指期货对沪深股市指数的影响

一般认为股指期货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双面性：一方面，股指期货具有很强的杠杆特征，期货的保证金制度，体现了股指期货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进一步放大了参与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另一方面，作为金融的衍生产品股指期货的主要功能就是套期保值。投资者可以根据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高度相关性，构建相应的投资组合，使得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上的收益与损失互相抵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市场风险，保证市场稳定。正是由于股指期货的这种两面性，在具体的环境下其对股票市场究竟是提升还是控制市场波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1、股市指数的价格发现功能

所谓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是指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通过大量的交易者相互之间不断报出价位而最终撮合成交，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实时价位，该成交价格能够较真实的刻画出股票现货市场将来的运行态势，交易者把该成交价当作现货市场价格的参考标准。股指期货发现合理价格的功能取决于它的交易制度的制定，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股指期货可以更快更及时的撮合成交。由于相对于现货市场股指期货交易成本更低、采用保证金交易并且具有做空机制，所以市场参与者更加愿意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特别是短线交易者。在面临市场信息的冲击时，股指期货价格就能更加及时快速的反映市场对价格的判断。第二，股指期货能够更全面地展示撮合的成交价格。虽然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的定价都是基于对将来的判断，但是股票市场只能形成一个价位，其只表示目前的价位和眼下的市场预判，而股指期货一般几个合约同时上市交易，其不仅可以反映近期的市场博弈结果，而且可以通过远期合约来更加全面的反映整个市场的预期。尤其在市场面临巨大风险时，股指

期货的远期合约可以发现正面的影响因子，为现货市场指数规避大幅下降提供帮助。另外，相对于同样具有该功能的商品期货，股指期货不仅在市场交易者数量和客户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两者可以二者价格发现效率不同；而且宏观经济信息对股指期货地影响较大，而商品期货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其更多的是对该商品的市场供求消息反映比较多，而且可能由于逼仓等原因而出现价格失真，而股指期货市场容量更大，价格形成后更加有效率。

2、套期保值

套期保值，作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投资方式，是指客户为了避免现货市场的损失，在期货市场上同时建立和现货市场数量一致、方向相反的股指期货合约，利用股指期货和现货市场上恰好相反的两个仓位，对现货市场的仓位进行很好的保护。套期保值交易可以帮助客户避免在现货市场上面临的大部分系统不确定性。依照客户期货合约开仓头寸的不同方向，股指期货的套保业务可以分为多头套期保值和空头套期保值。多头套期保值是指交易者因为害怕股市价格上扬而带来的持有股票成本升高，从而事先在股指期货市场上开仓做多，提前锁定将来购入股票的成交价格。空头套期保值是指已经购入股票现货的客户因担心将来股市下探，从而事先在股指期货市场上开立空单，以便对冲因股票价格下探带来的持仓亏损。

3、数据选取及实证分析

上海证券市场中上证 50 指数代表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及流动性，股票现货市场深度依赖上证 50 指数期货的推出。本文样本时间段为 2011 年至 2019 年，通过对样本结果研究，上证 50 股指期货的推出，提高了上证 50 指数日收益率的波动。上证 50 股指期货存在波动聚集现象，对股市波动有轻微程度影响。上证 50 股指期货日收益率与上证 50 指数日收益率相关性不强。由于上证 50 股指期货推出时间较短，个人投资者较多，缺乏对冲投资组合的运用，掌握的股市信息相对滞后，积压情形导致股市波动增大。其次，股指期货具有固定的杠杆效应。少数投资者会试图进行方向操作，设置投机套利行为，给期货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增大股市不确定波动。体制监管力度不够完善，也给股市波动带来不利影响。

四、结论

上证 50 股指期货推出对上证 50 指数日收益率波动有轻微影响。由于上证 50 股指期货推出时间短，个体投资者多，缺乏专业对冲投资组合的市场信息。且对市场运作滞后。股指期货固定的杠杆效应，给予部分投资者反向操作、投资取利的机会，增大股市不确定波动。我国对相应的体制监管力度不足。因此。需要建立股指期货交易松绑常态化政策；督促整治金融机构，建立规范化市场秩序，遏止投机套利行为；监管部门要合理引导个体投

资，优化投资组合结构，防止羊群效应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个体投资者要提升相关的专业知识素养，学会洞察并辨别市场信息，合理规避风险。

本文发现股指期货的推出对现货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并不大，反而在信息和市场价格的相互作用方面，股指期货的推出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提高了信息传播的质量，有利和改善了股票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股指期货推出后旧信息对市场的影响减小，这是因为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质量的提高，信息的持续影响力减弱。新旧信息对波动性的共同冲击效应减小，表明信息传播速度和质量提高后市场对信息反应能力加强，转移价格风险速度提高。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着杠杆作用，坏消息对市场价格影响更大，投资者对利空消息更加敏感，股指期货的推出加大了非对称效应。

第三章 货币互换协议助力中国进出口贸易复苏

窦一轩³

2020 年伊始，中国经济便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泼了一盆冷水。随后疫情蔓延全球，世界经济因为疫情被迫按下暂停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1.6%⁴，经济复苏任务艰巨。进出口贸易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3.2%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

在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趋于萎靡不振之际，政府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中国央行在双边贸易中能够有效管控汇率风险，保障本币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在疫情期间能够发挥作用，也有效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促进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与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

一、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发展进程

货币互换，又称货币掉期，是指两笔金额相同、期限相同、计算利率方法相同，按约定汇率进行的不同币种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损失。政府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与 14 个国家的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此来应对美元的可兑换性和固定汇率制之间冲突所产生的“特里芬难题”。因此，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动因主要是为了补充流动性，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

中国的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后“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2000-2008）

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的起始要追溯至 2000 年。第九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清迈协议》初步确定，将要求在亚洲各国从外汇储备中共出资 500 亿美元进行货币互换安排，扩大了亚洲各国参与货币互换的规模，为中国发展签署各项货币互换协议奠定基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阶段的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主要是为加强区域货币合作，提高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并没有对双边贸易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世界金融危机的应对（2008-2011）

在此时期，中国共与其他国家签订 11 份货币互换协议，其中除与乌兹别克斯坦协议外，

³ 窦一轩，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联系方式：19021004@bfsu.edu.cn

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7/t20200717_1776516.html）

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7/t20200717_1776516.html）

目前全部续约。为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各国政府纷纷采用货币互换补充流动性来规避汇率风险。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币值波动较小，成为了危机中各个国家竞相追逐的优质货币，人民币货币互换的规模有所扩大，各国为恢复经济而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3、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2011 至今）

随着全球经济慢慢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也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6 年，人民币加入 SDR，更是加快了国际化进程。截至目前，中国央行与和世界范围内的 40 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及相应机构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包括韩国、香港、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巴西等各大洲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规模超过 3.47 万亿人民币。人民币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互换圈，使用率也上升到全球第五位。尽管国际上“去中国化”的言论甚嚣尘上，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在稳定双边贸易汇率进而拓展两国贸易流量的领域持续产生积极影响。

二、货币互换协议对疫情期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新冠”疫情期间，尽管货币互换的规模日渐增大，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却产生了下滑，这是否意味着疫情期间，货币互换协议不再能对双边贸易产生正向的影响了呢？笔者对此现象有如下看法：

1、“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各国制造业、服务业难以有效应对，停工停产必然导致贸易货物量的减少，运输业停工停产更是使双边贸易雪上加霜。尽管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使企业能够稳定贸易中存在的汇率风险，但企业无法完成商品生产，进出口贸易的市场也因防疫需求基本处于关闭状态，货币互换协议这类政策性便利难以发挥作用，无法真正解决短期经济冲击。

2、“未雨绸缪”与“亡羊补牢”

“新冠”疫情属于“低频高损”型的系统性风险，是对生产制造、服务加工等产业的一次严重冲击，也是对国家货币、金融系统的一次压力测试。金融系统受挫，进出口贸易不可能安然无虞。疫情期间，美股多次产生“熔断”现象，世界金融市场萎靡不振，各国纷纷降息。由于疫情在各国出现的时间存在错峰，人民币汇率产生震荡。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例，1 月下旬到 2 月中旬，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 6.86 震荡贬值 2.5%至 7.04；2 月下旬到 3 月上旬，国内疫情迎来拐点，同时美国新增

确诊病例增多,引发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推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 7.04 升值 1.3% 至 6.95; 3 月中下旬,国外疫情蔓延叠加石油减产协议破裂导致美股持续暴跌,引发美元流动性危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承压贬值至 7.10; 6 月中下旬开始,中国进入疫情恢复期,汇率又持续走强,逐渐回到 7 以内。

面对疫情期间汇率的波动,出于防范汇率风险的需要,货币互换协议可以锁定利率而稳定金融风险,减少了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贸易额损失。进入疫情恢复期,伴随进出口贸易的重启,第二季度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较去年超过 3% 的增长率。货币互换协议的扩大不仅降低了企业进出口贸易的风险,也使交易对手方启用与中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额进行进口支付,如土耳其央行已经采取这一措施。货币互换协议规模的扩大不仅降低了疫情期间的经济损失,也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提前做了准备。

三、货币互换协议助力进出口贸易复苏的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疫情期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仍然能对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仍需要进一步发挥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以恢复经济、促进贸易,同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笔者综合当前已有的研究以及政策文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 继续推动人民币互换网络的扩大与离岸中心建设

通过前文货币互换协议在疫情期间作用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需要更积极地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与更多的国家签订更高额度的货币互换协议,为后疫情时期的进出口贸易规避汇率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并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加强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完善离岸结算机制与人民币流通渠道,提高人民币使用效率,降低结算成本,为双边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提供更多便利。同时,营造良好的货币互换环境,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建设等,不仅可以提高货币互换协议额度的使用率,也有效应对近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为我国后疫情时期的进出口贸易保驾护航。

(二) 利用货币互换协议额度为国内企业恢复生产提供金融支持

进出口贸易的恢复,首先需要生产的恢复。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要继续为企业减税降费,金融机构积极为中小企业投放信贷。因此,进出口贸易方面应该积极将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额度通过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机构为相关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促进生产的恢复与扩大,提高企业生产经营信心。

(三) 加强金融科技与货币互换的融合,创新货币互换形式

疫情期间,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得到长足应用,货币互换协议也不免与金融科技相结合,

例如 DCEP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中国数字货币的推出，将有效提升离岸货币的流通效率，提高他国使用人民币的积极性，并有可能拓展出货币互换的新形式，进一步提高结算效率，防范汇率风险，为双边贸易降低交易成本。

第四章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新兴市场动荡对全球金融经济的影响

殷嘉琦⁶

一、疫情推演的三个阶段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07月27日8时15分18秒，全球累计确诊超1636万例，死亡65万例。疫情暴发后，在我国政府和党的积极带领下，我国抗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美国和欧洲因初期重视不足，抗疫现状不容乐观。随着疫情进一步扩散，一些人口稠密、治理管理能力较为有限的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抗疫难题。

通过回顾梳理过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脉络，结合当下全球疫情大流行现状，疫情推演进程可能会按照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集中爆发于中国，海外疫情处于潜伏期（1月至2月）

自中国武汉发现新冠肺炎病例后，新冠疫情迅速在中国扩散。此后，泰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国相继发现零星确诊病例，海外疫情处于潜伏期，新冠疫情存在极高的全球蔓延风险。

第二阶段：全球疫情多点爆发，欧美成为关注“重点”（2月至4月）

由于中国政府积极有力的采取行动，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日本、韩国疫情加速蔓延，引起了全球忧虑情绪。随后，意大利、伊朗、美国等国的疫情开始迸发并逐渐恶化。海外累计确诊病例数量超过中国，市场避险情绪进一步升级。

第三阶段：疫情“重灾区”有可能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体（4月至跨年度）

在疫情的第三阶段，拉美、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成为疫情新的“重灾区”。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密集、很可能发展长期交叉、反复感染，加剧全球防疫难度，提高全球经济金融不确定性。从4月份前5日的病例新增情况看，除北美和欧洲部分地区逐渐进入“赶顶期”外，中非（103%）、南亚（78%）、南美（59%）等地区确诊病例飙升，5天内的确诊病例几乎翻番。

新兴市场的疫情管理风险尚未获得各方的充分重视，预期并未充分吸收，存在较大的次生风险。根据专家预测，疫情很大程度上会跨年度传播，并不能排除反复爆发的可能，因此

⁶ 殷嘉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19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邮箱：qiqiyin0703@163.com

新冠疫情仍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虽然新兴国家目前感染病例总量低于发达国家，但仍存在较大潜在风险，甚至影响全球抗疫的总体进程。

二、新兴市场防疫预期较差的原因分析

政府治理能力有限。政府的治理能力是抗疫效果的重要因素。虽然主要发达经济体前期也出现过政府重视不足的情况，但当政府加强认识，发达经济体是有能力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与之不尽相同的是新兴经济体由于政府整体治理能力较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医疗基础、社会管理体系尚未完善，会使防疫效果大打折扣。

经济结构加剧其受疫情的影响。新兴经济体主要以出口作为经济导向，经济更加容易受到外部需求的影响而产生波动。2020年，全球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大量外贸业务受到影响，外需迅速降低，这对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凸显，财政赤字上升、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等问题日益显著。新兴经济体在产业结构方面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相较于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传统制造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更为严重。

人口稠密、公共卫生建设不足。新兴国家普遍是人口大国，存在着人口稠密、流动性大的特点，这一人口特点又加剧了新兴国家防疫的困难。同时，新兴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基础建设、防疫物资供应能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两大特征使得新兴国家每人可以获得的卫生保障、抗疫物资较为紧俏。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中等收入国家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5.8%，不到高收入经济体（12.26%）的一半。截至2018年末，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3.01张床位，低于高收入国家（4.24张）的水平。根据市场调查机构（Markets and Markets）统计，2019年，全球个人防护用品（PPE，包括口罩、防护服等）市场中，高收入国家聚集的北美地区（37%）和欧洲地区（23%）PPE供给规模合计达6成，广大中低收入经济体合计仅占40%。

三、警惕新兴市场疫情对全球金融经济带来的冲击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其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举足轻重。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引起的动荡会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分析疫情下新兴市场的动荡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具体内容及相应的应对措施具有重大意义，是当前形势下，新兴市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1. 警惕疫情引发的金融风险

一方面，在新冠疫情的较差预期下，新兴市场资产被投资者大量出手外抛。一些新兴市

场经济体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国际收支赤字等因素，加剧了“货币危机”爆发的风险。

另一方面，部分疫情较为严重的大型新兴国家经济体量相对较大，与之对应，全球投资者对其风险敞口也较大。在疫情的冲击下，这些风险敞口发生违约的几率不断加大，存在潜在的债务违约风险，甚至引发“债务危机”。上述风险一旦发生，将会对全球金融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因此，在此情境下，新兴国家及其他国家都应协调各国货币政策，杜绝“以邻为壑”产生的巨大风险，持续关注疫情引起的金融风险 and 货币、债务风险的走势，并加大相关防范措施。

2.修复全球产业链，维护全球贸易稳定发展

一方面，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大型新兴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而受到疫情的冲击，一些情况较为严峻的地区的供应链受到破坏，跨国供应链被迫中断，使得全球供应链存在巨大风险。另一方面，随着疫情传播时间延长，供给压力与需求低迷相互交织，全球总需求持续收缩，海关防御等措施增加了贸易的成本，进一步使得全球贸易发展受限。

因此，各国应避免疫情期间的争吵，应及时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冲击，加强各国的协作，维护全球贸易稳定发展，分享防范疫情的有效措施，共同维护全球化进程。

3.稳定大宗商品价格水平，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一方面，一些新兴国家是大宗商品的主要供应国，在疫情的影响下，原油、煤炭、铁矿石、农产品等供给可能受到影响，而疫情使得全球需求大量下降，供需矛盾不断激化，加剧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不发酵，印度、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基于粮食安全的角度，逐渐对粮食出口进行了限制，使得全球粮食供应链破坏。这一行为加剧了各国的恐慌，出现了大规模的屯粮和限售行为。这无疑加剧了部分原本情况不容乐观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粮食危机。

疫情下，大宗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相继触发市场和汇率的波动，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在此情境下，国际组织应积极出台相应经济政策，各国也应增加经济合作，相互配合，共同稳定大宗商品价格，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性。

4.重新规划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做好长期、周期性准备

一方面，全球应紧密关注疫情发展新态势，根据全球疫情变化及时做好相应的调整，加强各国疫情互助行为，给予需要帮助的新兴国家相应的人员、技术及资金支持，不可忽视新兴国家对全球的影响。另一方面，各国应根据疫情防范进程，调整对全球经济的预期，做好疫情跨年甚至更长周期的准备，适当调整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时间窗口。此外，各国际组织应

加强合作，以便做出有力的协调反映，为全球经济体系增加流动性，稳定国际经济局面，共同防范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总之，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全球、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要考题，需要各国加强协作，求同存异，统一步调，共同打好、打赢这场持久战。疫情下的全球化不应是倒退的，而应重启全球化，共同推进全球化进程，共渡难关，共迎春天。

参考文献

1. IwataK, MiyakoshiC, "A Simulation on Potential Secondary Spread of Novel Coronavirus in an Exported Country Using a Stochastic Epidemic SEIR Model,"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2020, 9(4):944.
2. IMF, "Invisible Links,"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2019, Vol. 56, No. 2
3. IMF Kristalina Georgieva, Transcrip to Press Briefing by Kristalina Georgieva following a Conference Call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2020.03.27.
4. IMF, IMF Enhances Debt Relief Trust to Enable Support for Eligible Low-Income Countries in the Wak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MF Blog, 2020.03.27.
5. 罗志恒：《新冠疫情对经济，资本市场和国家治理的影响及应对》，载《金融经济》，2020年第2期，第8-15页。
6. 吕理哲：《新冠疫情的蝴蝶效应》，载《今日印刷》，2020年第4期，第27页。
7. 赵卫华：《越南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为何突然恶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第30-31页。
8. 程杰：《新冠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建议》，载《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第3期，第40-42页。
9. 姜跃春，张玉环：《新冠疫情不会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第17-20页。
10. 安国俊，贾馥玮：《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3期，第7页。
11. 任儒梦，金展颖：《新冠疫情下国际资本市场走向探究》，载《中国商论》，2020年第8期，第5页。
12. 姜峰，闫强明：《北大经院学者“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笔谈综述》，载《经济科学》，2020年第2期，第11页。
13. 彭建国：《疫情之下中国经济走势与企业发展对策》，载《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第3期，第30-

34 页。

14. 刘泓:《欧洲优势还能延续多久欧洲疫情防控困境解析》,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10期,第8页。
15. 罗振兴:《疫情下的美国经济:离衰退还有多远?》,载《经济》2020年第4期,第37页。
16. 陈锡康,杨翠红,鲍勤,等:《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对策建议》,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第35期,第1-5页。
17. 袁征:《美国危机应对的“是”与“非”》,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10期,第5页。
18. Cascella M, Rajnik M, Cuomo A, et al. Features,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coronavirus (COVID-19) [M]//Statpearls [internet].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0.
19. Nicola M, Alsafi Z, Sohrabi C, ed., “Th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coronavirus and COVID-19 pandemic: a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rgery*, 2020.
20. Gopinath G., “Limiting the economic fallout of the coronavirus with large targeted policies,” *Mitigating the COVID Economic Crisis: Act Fast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 2020: 41-48.
21. Qiu Y, Chen X, Shi W., “Impa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20: 1.

第五章 后疫情时代国际高等教育产业重启的机遇与挑战

董宜坤 孙琳¹

一、引言

全球高等教育产业的基本面正在因新冠疫情的持续而发生深刻变化。在过去一百年间，全球化塑造着现代高等教育的结构。学生与教学科研人员的国际流动、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以及知识网络构建即是高等教育产业国际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化的基本力量。而全球化、互联性、扩张性、资源高投入性让疫情之后的国际高等教育产业重启充满了不确定性。

从经济的角度，重启在初期呈现三个方面特点，波动性、分化性以及脆弱性。

1. 波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国际化重启动力不足。高等教育国际化复苏不是疫情后各国经济社会重建的重点；大学、学生、机构等各类参与主体信心不足，受制于有限的财政支持，国际化重启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

第二，政治化干预增强。各国排外势力极易因疫情后经济复苏缓慢而抬头，形成对国际学生与人才流动的极大阻力。国际化重启受本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Anne Marie Graham、Callan Quinn 等人的研究都强调了政治因素在国际化重启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作注）。

2. 分化性体现在国际学生流动差异化。疫情加强了国际留学产业买方市场的格局，国际学生流动将取决于特定国家及大学的教育服务、公共政策服务等多方面的品质。

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Simon Marginson 教授在 2020 年 3 月出席网络国际高等教育论坛时表示，疫情之后的 5 年内，国际留学市场竞争激烈的同时，规模会大幅萎缩，生源会更多选择留在本国或者选择临近国家留学。这使国际留学市场更加分化、脆弱。英美等高收入国家的大学份额将被留学性价比更高的留学目的国的大学分走。国际教育产业分散脆弱的状况至少需要 5 年时间才有望改善。

3. 脆弱性体现在高等教育产业结构脆弱性。过去几十年中，各类教育项目中介、大学桥梁项目以及招生代理公司为参与主体的国际高等教育产业，在后疫情时代面临急剧萎缩，新产业模式有待探索。

疫情后，曾经效益主要增长点的海外游学、访学项目面临结构化调整。旅行风险以及项

¹ 董宜坤，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琳，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生

理论探索

目含金量将成为项目竞争力的唯一评价标准。

脆弱性已经初显。国际教育交流协会（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是有 78 年历史的美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学生交换项目组织方。3 月 27 号宣布因“疫情引发严重财务压力”，将裁员 600 人，暂停所有项目。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学生交换计划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7 月 21 日宣布 2021-2027 年预算裁减 30 亿欧元，大幅收缩。

二. 经济视角下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启

从经济学的角度，疫情后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重启存在近期与远期的挑战。短期内，重启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大学收入萎缩、管理成本激增、退费诉求高涨、留学目的国间竞争加剧。

第一，大学收入锐减。

大学收入减少主要体现在来自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减少。根据 Miriam Berger 与 Andrew Smalley 的研究，许多国际学生因为担心自身的健康与安全，取消或推迟了留学计划；东道国疫情形势的不稳定与社会局势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原本有留学计划的留学生处于观望状态；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的签证政策与更加严格的出入境限制也影响了大学的国际招生。尽管部分对疫情形势比较乐观的学生提前预定了下学期的住宿，但是这些学生能否按期入学，仍然是未知数。虽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国家在疫情期间对于大学与学生采取了一些经济救助措施，其中包括对部分大学的直接财政拨款、学生资助政策改革、对于申请了勤工助学岗位学生的经济保障以及对于学生贷款还款期限的宽限等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总体来看，上述政府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在解决大学当下面临困境方面，仍是杯水车薪。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俄亥俄州富兰克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许多大学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许多大学不得不采取裁员以及无薪假期等措施维持学校运转。

第二，应对疫情的管理成本激增。

首先，公共卫生设施的支出。疫情期间，英美大学普遍增加了自己在医疗卫生设施方面的支出²，比如加大提供口罩等防疫用品、体温仪等设施；设置 24 小时的健康热线，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联系到专业医务人员；此外对于校内住宿较多的大学，宿舍清理整顿投入也大幅

² Universities prepare for the new post-pandemic world. <https://sciencebusiness.net/covid-19/news/universities-prepare-new-post-pandemic-world>

增加。

其次，线上化教学系统的投入。大学为实现由线下授课到线上授课的转变³，需要加大对线上授课设备的投资，并为学生提供线上授课技术支持；

再次，校园关闭期间，大学需要协助临时无法回国的国际学生安排食宿，并为部分学生提供短期经济援助，比如，直接发放各类名目的奖学金与助学金、在线上授课期间向缺少网络条件或硬件设施的学生发放专项补贴、按照疫情前的标准向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勤工助学工资等等；

第三，各留学目的国退费诉求不断增长。

根据英国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夸夸雷利·西蒙兹发布的一项关于疫情对大学招生影响的调查，78%的学生认为，如果大学采取线上授课的方式，学费应当有所减免，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在线上授课的学期，大学应当减免学生21%-50%的学费。然而，有研究指出⁴，尽管目前只能线上授课，大部分大学坚持向学生收取全额学费。学生与校方的分歧使得退费诉讼日益增长，美国大学发生的学费诉讼总量最多。

各国大学对于退费诉求表达出强硬立场，政府政策干预意愿有限。在英国，截止四月初，超过32万人登陆英国议会官方网站情愿，呼吁高校向学生退还学费与住宿费。而英国教育主管部门并未对此做出明确表态，一方面强调，大学应当维护学生权益，另一方面又表示，大学有权做出最后的决定。大多数加拿大大学明确表示不会进行学费退费，仅有个别大学做了费用微调。比如，多伦多大学退还了部分学杂费，康考迪亚大学推迟了学费支付的截止日期，乔治布朗学院减半秋季学期学费预付押金。

美国大学面对的学生诉讼较为复杂。首先是诉讼数量呈增长趋势。截止到八月初，美国有超过六十所大学都面临与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其中不乏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埃默里大学在内的顶尖大学。诉讼学生认为线上授课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明显下降，要求学校退还部分学费。其次是诉讼范围的扩大。学生与高校之间的矛盾逐渐由个案升级为集体行为，并且因为专业律所的介入，逐渐形成了当前集体诉讼的局面。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法律公司曾表示，截止七月中旬，公司已经提出了三十多起以美国大学为被告的诉讼，为此还曾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2020年大学退费”的网站处理类似需求。

³ Higher Education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COVID-19). <https://www.ncsl.org/research/education/higher-education-responses-to-coronavirus-covid-19.aspx>

⁴ Universities prepare for the new post-pandemic world. <https://sciencebusiness.net/covid-19/news/universities-prepare-new-post-pandemic-worl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ruggle to pay increased fees, demand refunds. <https://thepienews.com/news/international-students-struggling-to-pay-increased-tuition-fees-demanding-refunds>

第四、留学目的国间对国际生源的竞争加剧。

作为英语留学的两大目的国，疫情后美英的高等教育产业受冲击最严重。虽然美国高水平大学与在硅谷等地的美国高科技产业在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等领域的紧密合作，使其对于国际学生仍保有较大吸引力⁵，但由于美国从疫情之中恢复较慢，短期内许多国际生源或被其他国家抢占。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 Ted Mitchell 表示，疫情预计将会导致美国大学招生总量下降 15%，而国际学生的招录将下降 25%，由此造成的大学财政损失高达 230 亿美元。

英国大学预计国际学生流失造成的损失将高达 190 亿英镑⁶。英国政府向大学投入 26 亿英镑国际学生专项资助⁷，其中约 15 亿英镑用于弥补大学因国际学生减少而面临的财政困境。英国多所大学通过包机解决旅行禁令限制；近三成的大学为学生提供学费减免或奖学金，减少学生的经济压力。比如，杜伦大学超过二十个商科专业可以获得 25% 的学费减免，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向学生发放补贴，新生可获得 1000 英镑，返校生可获得 700 英镑。

有研究显示⁸，相比于英国与美国，目前疫情形势已基本稳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国际学生招录率将先复苏。预计在未来一到两年，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所招收的留学生在所有留学生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分别提升 6%、2% 与 1%，这也将给他们的教育与经济带来较大利好。除了相对稳定的疫情形势，加、澳、新的大学采取学费奖励、申请条件个性化等方式加大对国际学生的招生。比如，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大学都延迟了申请人提交语言成绩或其他材料的最后期限，汤姆逊大学允许学生迟交或暂不提交雅思成绩，学生可以选择在入学之后参加英文测试。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取消了申请费，悉尼大学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学生进行了部分学费减免，塔斯马尼亚大学开通了安全网拨款计划快速通道，学生可以通过这一通道申请学费与生活费资助。

三. 高等教育国际化重启面临的长期经济挑战

国际化重启的短期经济压力因疫情的持续，而演变升级为结构性经济挑战。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就是高学费经营模式难以为继；大学科研投入影响明显，国际学术合作将受到限制。

疫情持续致使大学教学服务与国际招生充满不确定性，以高学费为支撑的大学运营难以

⁵ Universities prepare for the new post-pandemic world. <https://sciencebusiness.net/covid-19/news/universities-prepare-new-post-pandemic-world>

⁶ Will universities need a bailout to survive the COVID-19 crisis? <https://www.ifs.org.uk/publications/14919>

⁷ Government refuses multi-billion pound bailout for universit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0/may/04/government-refuses-multi-billion-pound-bailout-for-universities>

⁸ Pandemic to redistribute international student flows.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pandemic-redistribute-international-student-flows-report>

理论探索

为继，但新利润增长点短期内难以形成。

疫情持续，线上学习常态化将影响国际学生的入学意愿。相关研究显示⁹，国际学生对线上学习的质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线上学习的质量与学习效果；其次是线上学习所需的网络条件与硬件设施有限；此外线上学习缺乏实际社会与大学文化生活的体验。这些限制因素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国际学生的入学意愿。

然而国际学生份额的萎缩对英美澳加等主要留学生目的国大学现有的高学费商业运作模式形成较大冲击。为缓解当下的资金短缺、改善流动性，大学进一步提高了对国际学生收费标准。然而由于疫情后留学产业逐渐形成买方市场，这些举措实质上无法扭转大学的财政困境。

持续的财政压力将极大制约大学科研投入，以及国际学术合作的进行。Paola Loriggio 的研究以加拿大大学为例，分析了财政紧缩对国际科研合作的制约影响。他认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拨款大幅降低，这导致大学在财政困难与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对于学术与科研的投入相对减少，进一步抑制国际学术合作的发展。

四、美国大学国际化重启的经济因素

本部分选择美国大学疫情后国际化重启进行案例分析，主要有四方面原因：第一，美国国际高等教育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贡献突出。美国拥有超过 5100 所高等教育机构，是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产业国。2017-2018 学年，美国高等教育产业总收入为 6710 亿美元，占全球总产值的 35%。2018-2019 学年，前往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为美国带来了 410 亿美元的收入以及 45.8 万个工作岗位；第二，美国是全球第一留学目的国。《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9)》显示，当年全球留学人数约 500 万，留学美国学生超过 110 万，比第二大国英国多 1 倍；第三，作为遭受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国家，根据美国卡托研究所统计，截止 2020 年 7 月 31 日，已有 33 所大学宣布永久关闭，涉及学生总数为 5690 人。高度国际化的美国大学产业所遭受的冲击，同比其他国家，更具代表性。因此，美国大学国际化重启的动机更迫切、形势更复杂、政策更多样。对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重启的趋势有积极意义。

从经济的视角，美国大学国际化重启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截止 8 月中旬，秋季学期采取“完全线上教学”或“以线上教学为主”的美国大学已过半数¹⁰，并且这

⁹ Universities prepare for the new post-pandemic world. <https://sciencebusiness.net/covid-19/news/universities-prepare-new-post-pandemic-world>; Some Canadian universities say fall classes will be offered primarily online, <https://www.cbc.ca/news/canada/covid-universities-online-1.5565810>

¹⁰ Fall 2020 Plans. <https://collegecrisis.shinyapps.io/dashboard/>

理论探索

个数字仍在增长。而国际学生对大学在线教育质量的质疑也呈上升态势。二是作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目的国,疫情导致的国际学生流失以及海外学习项目暂停带来的财政困难短期内难以纾解。

首先,美国大学海外留学项目的沉没成本因疫情激增。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布的报告¹¹,由于疫情影响,93.3%的美国大学取消了海外学习项目,由于前期投入无法收回,高额的沉没成本对大学财政造成沉重压力。其次,英国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夸夸雷利·西蒙兹(QS)发布的报告显示¹²,约有57%的本科生、67%的授课型硕士以及66%的研究型硕士推迟或取消了原有的留美计划。由于大多数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就读期间支付全额学费,来自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是美国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Hayoung Kim等学者的研究,学费类的收入约占四年制公立大学总收入的26%,占四年制非营利性私立大学总收入的35%。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发布的预测¹³,在2020年秋季学期,大学对于国际学生的录取预计将减少25%,这也意味着美国大学的直接经济损失将可能高达100亿美元,同时会造成11.4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美国疫情的持续,使得秋季学期原计划实施混合式教学的大学纷纷更改计划,关闭学校转为完全线上教学,这将影响美国大学国际学生招录量降幅达到30%及以上¹⁴。

总之,疫情持续,在线教学呈常态化,美国大学国际化重启的挑战就是平衡财政压力与国际学生对远程大学教学服务性价比的质疑。

五、美国大学国际化重启的应对

为了兼顾防控疫情、纾解财政困难、提高国际生报考率,国际化重启采取平衡化、渐进式策略,主要举措有三个方面:

1、对国际学生的经济支持多元化

在对国际学生经济支持上,美国大学分成两个阶段。疫情后初期,经济支持以住宿费退

¹¹ Financial Impact Survey. <https://www.nafsa.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2020-financial-impact-survey.pdf>

¹² How COVID 19 Impacting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ifferent Study Levels Report. <https://www.qs.com/portfolio-items/how-covid-19-impacting-prospective-international-students-different-study-levels>

¹³ Financial Impact Survey. <https://www.nafsa.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2020-financial-impact-survey.pdf>

¹⁴ US faces 'minimum 30 per cent decline'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 numbers. <https://theboar.org/2020/08/us-decline-international/>

费、学杂费微调为主¹⁵。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的数据显示¹⁶，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大学为在校的国际学生提供了经济支持，主要的形式包括食宿费退费（占 60%）以及提高奖学金（占 59.2%）。

第二个阶段，给予经济支持的大学增多，经济支持范围扩大，除了初期的各种举措，部分大学还实质性下调学费。截止 8 月上旬，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宣布秋季学期学费下调 10% 到 15%，其中不乏顶尖大学¹⁷。但大多数学校仍采取间接、小额度的形式下调费用，比如免除申请费、录取通知费、延期费等杂费、延迟涨学费、个性化降费、以学费减免的形式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等方式，平衡学生的诉求与大学财政负担增长之间的关系。

2、改革招生政策与录取政策。

美国大学通过线上宣讲、推迟入学申请截止日期、采用更加灵活的录取标准等方式，保证国际学生的录取率与入学率。在招生宣传方面，美国大学组建了全面的线上宣讲会、虚拟校园游览等一揽子线上方案进行招生宣传。

本科录取政策也更加个性化，给国际学生们更多的选择权。相关研究显示¹⁸，36%的美国大学推迟了申请截止日期，27%的美国大学推迟了学生接受录取的最后期限，以留给留学生更多时间考虑是否接收录取，40%的大学允许学生在获得录取资格时选择推迟自己的入学时间。比如，哈佛大学将 2+2 项目的申请截止日期延期到 2020 年 6 月 1 日，阿克伦大学、纽约理工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也将申请日期延期到 2020 年 6 月 1 日，夏威夷大学、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将入学申请的截止日期延期至 2020 年 8 月 1 日，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没有推迟申请截止日期，但允许学生延后提交申请材料，耶鲁大学允许学生在学院同意的情况下，延迟一学期或一年入学。

在录取标准方面，学校不再将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唯一录取标准，对于短时间内无法取得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学生，学校采用了教师线上测评、综合认定申请人学术能力、放宽申请条件等替代方案。Martel 的研究指出，84%的大学在疫情之下对于国际学生招收采取了新的措施，44%的大学允许学生用线上考试所获得的成绩代替传统的线下考试成绩，26%的大学允

¹⁵ Higher Education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COVID-19). <https://www.ncsl.org/research/education/higher-education-responses-to-coronavirus-covid-19.aspx>

¹⁶ Financial Impact Survey. <https://www.nafsa.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2020-financial-impact-survey.pdf>

¹⁷ US universities cut fees as students show reluctance to return.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us-universities-cut-fees-students-show-reluctance-return>

¹⁸ COVID-19 Effects on US Higher Education Campuses: From Emergency Response to Planning for Future Student Mobility. <https://www.iie.org/-/media/Files/Corporate/Publications/COVID-19-Survey-2-Report-WEBSITE.ashx>

理论探索

许学生用其他学术能力证明材料代替 SAT 等标准化考试的成绩，21%的大学不再把各类成绩单与学术能力证明作为申请的必要条件，27%的大学允许学生在线提交申请材料。

3、从宣传到管理，坚持线上教学与服务的品质。

在线上教学方面，大学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线上教学质量，比如，开发功能更加强大的在线授课平台、提供教职人员线上教学培训、增加投入改善线上学习环境，开发多种类型的线上学习模式，满足学生不同需求，研究显示，近半数的大学投资购买了新的在线教学平台¹⁹；一些大学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了用于提升网络条件与购置线上授课所需硬件设施的经济补贴，以保障教育公平，减小数字鸿沟；部分大学借助线上教学的契机，提供个性化培训服务，推出了更加灵活实用的课程设置与考评机制以吸引学生就读。比如，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东北大学等都推出了多种短期证书课程，在传统的学习模式之外，提供短期集中专业培训以适应学生的需要，此类证书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新的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因此也广受学生好评。

国际科研伙伴关系网络受疫情防控、旅行禁令限制，影响明显。但疫情相关学科领域的国际合作已率先重启。

在国际科研合作方面，疫情使得美国的许多大学在转为线上授课与远程工作的同时，也关停了线下的实验室，并终止了所有“非必要的”科研实验。科研人员出国行程的取消也使得国际间科研交流合作减少。目前，美国大学正计划逐步重启科研合作项目，并积极与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在疫情研究与防控领域率先展开合作²⁰，比如，在疫情期间共享实验数据与研究成果，在疫情研究中共享高性能计算资源，对于有发展潜力的医疗技术实行特许制度等等。

六、结语

从经济的视角看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产业国际化重启，极具复杂性。本文从短期与长期两个角度探讨了主流英语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重启面临的挑战，并以美国大学为例，分析其重启的对策。

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产业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分化性、脆弱性。产业重启呈现出渐进型与国别差异化特点，竞争趋于激烈、无序。通过调动国内与国外政策资源、提升教育品质、革新技术、优化国际学生服务、优化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等，对冲疫情后的不确定性，重塑全

¹⁹ Online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s://educationdata.org/online-education-statistics>

²⁰ Moving academic research forward during COVID-19.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8/6496/1190/tab-pdf>

理论探索

球高等教育产业格局。

参考文献

1. Andrew Smalley, Higher Education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COVID-19),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23 July 2020, <https://www.ncsl.org/research/education/higher-education-responses-to-coronavirus-covid-19.aspx>, 访问日期:2020年7月31日。
2. Callan Quin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ruggle to pay increased fees, demand refunds, The PIE news, 16 July 2020, <https://thepienews.com/news/international-students-struggling-to-pay-increased-tuition-fees-demanding-refunds>, 访问日期: 2020年7月31日。
3. C2i Dashboard, Fall 2020 Plans, <https://collegecrisis.shinyapps.io/dashboard>, 访问日期: 2020年8月7日。
4. Éanna Kelly, Universities prepare for the new post-pandemic world, ScienceBusiness, 9 July 2020, <https://sciencebusiness.net/covid-19/news/universities-prepare-new-post-pandemic-world>, 访问日期: 2020年7月31日。
5. Elaine Drayton and Ben Waltmann, Will universities need a bailout to survive the COVID-19 crisis?,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6 Jul 2020, <https://www.ifs.org.uk/publications/14919>, 访问日期: 2020年8月7日。
6. Mirka Martel, COVID-19 Effects on US Higher Education Campuses: From Emergency Response to Planning for Future Student Mobility,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4 May 2020, <https://www.iie.org/-/media/Files/Corporate/Publications/COVID-19-Survey-2-Report-WEBSITE.ashx>, 访问日期: 2020年8月7日。
7. NAFSA, Financial Impact Survey,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May 2020, <https://www.nafsa.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2020-financial-impact-survey.pdf>, 访问日期: 2020年7月31日。
8. N. S. Wigginton et al., Moving academic research forward during COVID-19,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2 Jun 2020,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8/6496/1190/tab-pdf>, 访问日期: 2020年8月7日。
9. Paola Loriggio, Some Canadian universities say fall classes will be offered primarily online, The Canadian Press, 12 May 2020, <https://www.cbc.ca/news/canada/covid-un>

理论探索

- iversities-online-1.5565810, 访问日期: 2020年7月31日。
10. Paul Basken, US universities cut fees as students show reluctance to return, 12 August 2020, Times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us-universities-cut-fees-students-show-reluctance-return>, 访问日期: 2020年8月13日。
 11. QS, How COVID 19 Impacting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ifferent Study Levels Report, 19 June 2020, <https://www.qs.com/portfolio-items/how-covid-19-impacting-prospective-international-students-different-study-levels>, 访问日期: 2020年8月7日。
 12. QS, The Outlook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s: The Impact of COVID-19, 18 June 2020, <https://www.qs.com/portfolio-items/outlook-university-admissions-impact-covid-19-report>, 访问日期: 2020年7月25日。
 13. Reece Goodall, US faces ‘minimum 30 per cent decline’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 numbers, The Boar, 7 August 2020, <https://theboar.org/2020/08/us-decline-international>, 访问日期: 2020年8月10日。
 14. Richard Adams, Government refuses multi-billion pound bailout for universities, The Guardian, 4 May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0/may/04/government-refuses-multi-billion-pound-bailout-for-universities>, 访问日期: 2020年8月13日。
 15. Andrej Bastrikin, Online Education Statistics, Education Data, 12 April 2020, <https://educationdata.org/online-education-statistics>, 访问日期: 2020年8月13日。

第六章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及应对

沈琴琴¹

【摘要】对于突发性的的大规模疫情，相关部门往往会采用感染人数、致残人数、死亡人数等流行病学参数来衡量和描述突发性大规模疫情的危害程度，尽管这些参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疫情的严重程度，但这些参数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和描述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其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往往比参数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本文从微观、宏观等方面分析预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地各级政府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济；社会；政府

随着近几年社会经济的发展，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对经济的危害愈加严重，不仅会严重威胁社会公众的人身健康，还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其破坏程度甚至比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更为严重、更为全面地影响国家、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

一、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影响经济的特点

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良好运行自身的经济体系就必须重点关注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等各种基本要素。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并不是影响经济运行效果的要素，短期内并不会影响经济运行的各个生产要素，但疫情防控工作及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引发的恐慌心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消费、投资、生产等行为，进而冲击经济体系。相较于普通的流行性疾病，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具有突然爆发、传播迅速、影响区域集中、公众恐慌心理较重、个别行业影响较大、短期影响与破坏明显、疫情过后经济的恢复速度较快等特点。历史上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并不常见，对其研究、处理、防控等方面的经验较少，其对经济的影响也不明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SARS、H1N1 流感等突发性大规模疫情的爆发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其中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为甚。现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例，详细探究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状况，希望能对相关工作人员在减轻和处理疫情对经济影响程度方面的工作提供借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于 2019 年底发生于我国湖北省，其爆发突然，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向包括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是近几年爆发的奠定的突发性大规模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现正持续，截至 2 月 24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47672 例（其中重症病例 9126 例），累计死亡病例 2663 例，但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全球性的、毁灭性的。首先，各级各类政府部门

¹ 沈琴琴（1980—），女，浙江富阳人，本科，工程师，兼职教师，主要从事企业技术培训研究。

理论探索

要调动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治疗感染者和检测疑似者，这对政府财政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其次，疫情还间接引发了政府颁布相关的控制措施，进而导致交通封闭、旅游行业暂缓、零售业发展受阻等各行各业的问题，使得经济发展的相关要素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滞缓。最后，疫情引发的心理恐慌也对经济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国际会议及国际活动被迫中断、国内的大型活动也被迫取消，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心理，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1. 微观方面

爆发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微观层面即感染者的治疗与疑似者的检验工作势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再加上，疫情还引发了社会公众产生恐慌心理，进而造成经济损失。微观层面的经济影响包括直接经济影响和间接经济影响，直接经济影响又可分为医疗损失和非医疗损失，医疗损失是指在治疗和检验患者的过程中由患者个人或政府部门支付的研发疫苗的费用、化验费、手术费、住院费等费用；非医疗损失是指患者因病致残或因病致死产生的费用，患者就医途中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例如：部分 SARS 患者在治愈出院后会伴随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患者不仅要承受巨大的身心痛苦，无法继续正常生活工作，还要承受巨大的医疗费用。

计算直接经济损失的方法较为简单，通过调查、统计就可以很简便地获取相关数据，在短时间内估计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进而成为衡量疫情发生过程中患者治疗成本与患者治疗效果、如何利用有限资源产生最大效用的直接依据。常用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有：成本确定分析法、成本效果分析法、成本效用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等，上述评估方法的侧重点不同，但其均以直接经济损失为基础来计算成本部分。

间接经济损失是指因疫情而导致的停工、停产、停课及因恐慌心理而导致的额外支出或收入减少等情况，这种经济损失比直接经济损失更为庞大，仅仅以工厂停工、停产为例，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是十分明显且十分重大的。同时，突发性大规模疫情使人们的沟通方式、获取信息的方式与途径、办公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例，在疫情期间人们只能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进行沟通、交流与办公。

2. 宏观方面

很多学者在研究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对经济的宏观影响主要侧重于疫情期间 GDP 的变化方面，但这种研究方法是片面的，GDP 只是衡量各类事件对经济的整体影响，其中还存在正

理论探索

负抵消的情况。因此，只有具体讨论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对各个行业的影响，才能制定各种有效保护经济的措施与制度，进而更好地促进措施与制度的实施。首先，医疗卫生行业是受突发性大规模疫情暴发最直接的行业。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为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之前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较小，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进而使得我国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建设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我国薄弱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也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和蔓延的深层原因之一。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中存在的弊端，但从长远来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也给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了一定的改革与创新契机，使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推动了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进步，也有效改变了我国“政府办医院、政府管医院”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加快了我国医疗产业化发展进程。其次，第三产业也是受突发性大规模疫情负面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例如：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等行业。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对上述产业影响的特点为影响迅速、影响直接，在这其中以旅游业的影响最为明显，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例，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出入境旅游人数相较同期呈断崖下降的趋势；交通运输业也是受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高峰期，我国的铁路、公路、民航等的客流运输量呈断崖下降趋势，但这种影响也将随着疫情的结束而迅速消散，与疫情发展情况基本保持同步；很多民众也尽量减少或完全避免前往拥挤的公共场所；随着交通运输业的逐渐萎缩，与之相关的餐饮业、酒店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也受到了较为直接且严重的冲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我国大型购物中心受疫情的影响较大，但对以经营食品和日用品为主的超市影响较小。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电子商务行业逐渐兴起，疫情的爆发使公众更为关注自行的身体健康而拉动保险业、通信业的发展。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较小甚至完全没有影响。以 SARS 为例，我国在疫情期间的家电、家具等耐用品的制造业没有受到影响，汽车制造业甚至因需求增加而有所发展。突发性大规模疫情的爆发会使某些疑为疫情传染源的农产品的销售受到影响，例如，H1N1 流感期间我国的猪肉销售受到冲击，但从总体上来说，突发性大规模疫情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影响较小。最后，除了因突发性大规模疫情而直接受其影响的部分行业之外，部分行业还会因行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而受到较大程度的间接影响。例如：由于疫情期间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受阻，成品油的消耗随着减少，与之相关的石油行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进而使股票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在短期内受到打击，股票价格下跌，股票市场发展面临困境。此外，从长远角度来看，突发性大规模疫情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长时间的、结构性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仅会持续于整个疫情期间，也会对资本流动、投资

理论探索

活动、贸易活动等方面会产生长久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会促进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与创新，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与疾病预防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对相关行业的发展具有持续性的促进作用。

3.供需方面

疫情引发的公众恐慌心理及行为变化最终通过供给需求状况以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情况，微观层面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公众心理、行为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供给、需求层面。突发性大规模疫情造成的供需变化主要集中在某些特定行业和特定区域，究其根本是由疫情本身的影响、疫情处置工作及社会恐慌产生的行为与心理变化，主要包括患者医疗需求变化而引起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变化；因病致死、致残、停产、停工而引起的劳动力供需变化；公众消费、饮食、生产、生活方式改变而引起的消费需求变化；工作方式发生变化而引起的生产生活产品供需变化；金融机构和个人储蓄、投资行为变化而产生的资本供给情况发生变化等。

突发性大规模疫情的爆发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了医疗卫生制药方面的需求，例如：2009年爆发的 H1N1 流感疫情，我国在疫情期间累计签发了一亿多份流感疫苗。同时，流感疫情的爆发还使得各地的抗病毒药物、抗病毒护具、抗流感药物、口罩等用品的需求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劲地拉动我国的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需求；但同时疫情暴发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需求也并不都是正向的、积极的。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期间，很多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感染者由于担心医院内的病毒感染，尽量减少或避免去医院就诊，很多地区的门诊患者与住院患者相较往日有大幅度的下降，部分疫情重灾区的医院门诊甚至处于歇业状态。其次，突发性大规模的疫情也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劳动力的供求情况是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因素，突发性大规模疫情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伤残，进而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同时，突发性大规模的疫情还会使工厂复工难、工人旷工、劳动力外流等问题，进而引发短时间内的劳动力短缺与配置不均等情况。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恰逢春运期间，很多在疫情暴发地——广东地区务工的外地农民工大量返乡，不仅加大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还使农村劳动力过剩进而使得城市的劳动力短缺，严重影响疫情过后的复工、复产进度。最后，投资环境是否安全是影响投资者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疫情的爆发使得投资环境的安全性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减弱，再加上疫情造成的劳动力价格升高等原因，投资收紧、资金供给不足。此外，由于疫情存在较高的风险性，如若公众依旧进行出行、旅游等休闲娱乐活动，势必会加大感染病毒的风险甚至直接感染病毒，因此，相较于进行娱乐休闲活动，人们更愿意将可支配收入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人们的消费需求逐

理论探索

渐降低、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电子商务行业因能有效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而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和进步。

三、预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我国各地经济的影响

结合 2019 年末我国各省（区、市、自治区）的 GDP 增速，可以推断出 2020 年各省（区、市、自治区）第一季度 GDP 累计增速（假设一季度各地 GDP 增速保持 2019 年全年增速不变）为：湖北省是疫情的初始发生地也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其经济影响受疫情的影响较大，2020 年一季度地区 GDP 累计增速将会较 2019 年末下降 3.06 至 6.05 个百分点，其一季度 GDP 增速将维持在 1.45%至 4.44%之间，其增幅降幅最大。SARS 疫情暴发后由广东、北京两个疫情中心向各省（区、市、自治区）扩散，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只有湖北省这一个疫情中心，但由于此次疫情正值春运期间，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具有很强的人员流动性，存在很高的疫情扩散风险，因此，北京、上海这两地的经济增长受疫情的影响较大，疫情对北京经济增速的影响主要在 2.03 至 3.27 个百分点，其一季度 GDP 增速将维持在 2.83%至 4.07%之间；对上海经济增速的影响主要在 1.86 至 3.02 个百分点之间，其一季度 GDP 增速将维持在 2.98%至 4.14%之间，增幅稍高于北京。与湖北省相近的浙江、湖南、广东、河南、重庆、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份，人员流动量较大，因此上述省份受疫情的影响也较为严重。疫情的冲击使上述地区一季度 GDP 增速在 1.57 至 3.00 个百分点。江西、湖南、安徽、河南等省份的经济增速保持在 4.5%以上，其中江西的一季度 GDP 增速将会保持在 5.42%至 6.44%之间。由于黑龙江、福建、广西、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宁夏、内蒙古等省份（自治区）离湖北较远，因此，上述地区受疫情的影响较小，其 GDP 增速在 1.17 至 2.55 个百分点，其中，福建、云南、贵州、四川的一季度 GDP 增速可能会维持在 6.00%以上，但由于黑龙江本身的经济增速较慢，其一季度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海南、吉林、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省（市、自治区）离湖北的距离更远，其受疫情的影响更小，经济增速在 1 个百分点左右。²

四、经济现状分析及应对

1. 稳妥处理好疫情控制和恢复生产之间的关系，做好疫情得以控制后经济的恢复工作

目前，尽管有迹象显示总体疫情已开始趋于平稳，但拐点尚未出现，日新增病例仍在高位运行，因而仍需对疫情保持高度警惕。未来几天，伴随着大规模务工人员返程高峰，疫情扩散

² 李杰红.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经济发展[N]. 河南法制报,2020-2-20(1).

理论探索

风险依然较高。特别是武汉以外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和重庆等）发生第二轮爆发性传染的风险不容低估。

不可否认，疫情控制和恢复生产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但是，在疫情拐点尚未出现、蔓延风险仍然较大的情况下，控制疫情仍是第一要务，在风险可控区域有序恢复生产和服务，因为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整个经济增长将会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建议相关决策部门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考虑适当调低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譬如，可以调至 5-5.5%。

当然，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疫情对正常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也非常必要。随着全国大范围复工日期临近，各地可根据当地疫情具体情况，针对不同企业、行业特点和业务模式等，推出差异化、梯次化复工政策，并保持政策灵活性。

随着全国各地的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后，各地各级政府部门要逐渐将工作的重点放到恢复社会生产、生活中去。第一，各地各级政府要逐渐放宽、解除疫情期间的限制措施，逐渐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加快推进企业、学校的复工、复课进程。第二，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免税收、降低社保缴费力度等优惠政策给予中小企业相应的优惠。第三，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放宽因疫情造成的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2.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满足应对疫情冲击的经济支撑需要

一方面，进一步减少中小企业税收负担，对受疫情冲击严重、但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企业直接给予补贴。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努力增加对文教卫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提升总需求水平，同时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大约为 3%，低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仍有一定政策空间。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冲击，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

3.适当放松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确保金融市场稳定

面对空前疫情冲击，可考虑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和基准利率，继续增加流动性释放，降低融资成本，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与此同时，要努力维持资本市场稳定。2月3日，中国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如期正常开市，显示了政府的自信以及维护市场规则的决心。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完全正确。A股虽然在开市当日大幅下跌，但在后续几个交易日很快趋向稳定。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引导市场回归理性，稳定投资者预期。

4.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应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在短期内可以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扩张空间有限，必须充分考虑扩张性经济政策的长期后果。事实上，

理论探索

通过加大市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积极性,切实保护其投资信心,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且其积极影响更为持久。

5.大幅度增加财政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努力缓解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瓶颈

这次疫情充分暴露我国在防疫、医护、医院等医疗卫生领域投入不足。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百分比为6.6%,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在10%以上。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卫生支出额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方面的成功转变,应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和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6.推进和加快地方治理体系的改革,积极探索和完善突发事件响应机制

此次疫情是一次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的重大突发事件,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极大挑战,同时也是一次反思、学习、完善和变革应对机制的契机。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和机制设定时,可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充分听取医疗专家及危机管理专业人士及机构的建议,建立响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预警和应对机制。

此次疫情的爆发也暴露出了我国政府部门治理体系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地方利益与全国利益之间的矛盾等诸多问题,各地各级政府部门要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推动我国的政府部门治理体系、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等方面和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力度。

参考文献:

1. 罗志恒. 新冠疫情对经济、资本市场和国家治理的影响及应对[J]. 金融经济, 2020(2). 8-15
2. 张文斗, 祖正虎, 等. 突发传染病疫情经济损失评估研究进展[J]. 军事医学, 2012(10). 797-800
3. 王雪超. 把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N]. 天津日报, 2020-2-25(7).
4. 任欣欣. 坚持法治思维 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双赢[N]. 岳阳日报, 2020-2-25(4).
5. 张胜, 王斯敏, 焦德武, 祖正虎, 等. 问题及对策[N]. 咸宁日报, 2016-5-6(4).
6. 黄睿麒.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N]. 宜宾日报, 2020-2-24(1).
7. 申国华. 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不误[N]. 兵团日报, 2020-2-21(3).
8. 李杰红.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经济发展[N]. 河南法制报, 2020-2-20(1).
9. 卓尚进.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N]. 金融时报, 2020-2-19(2).
10. 陈凌.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N]. 宜春日报, 2020-2-22(3).

第七章 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殷嘉琦³

【摘要】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和国际投资协定数量激增，大量国际投资争端案件的审理使得传统的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简称 ISDS 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由于投资仲裁存在着仲裁裁决不一致、缺乏透明度和当事方利益失衡等缺陷，使其裁决无法实现实体性公正，导致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ISDS 机制的改革已经变成了国际投资领域的共识。本文以 Philip morris 案为例，对目前 ISDS 机制在实践中产生的主要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未来 ISDS 的改革提出了展望，并对未来中国缔结投资条约时的考量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 ISDS 机制；利益平衡；ISDS 机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赢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将西方殖民者建立的企业收归国有，由此导致了大量投资争端，国际习惯和外交手段已经不足以化解这些争端。为解决不断增多的投资争端，同时也为了让投资者能够更加便捷的保护自身权益，1962 年，在世界银行的主持下，世界多国签署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亦称《华盛顿公约》），并同意以此作为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依据。《华盛顿公约》首先在国际上确立了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1968 年签订的荷兰—印尼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简称 BIT）是国际上第一个纳入 ISDS 机制的双边投资协定，其后签订的 BIT 或者自由贸易协定投资章节大多数也都包括 ISDS 机制。2016 年 2 月 4 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 TPP）正式签署，TPP 正式协议文本一经公布，其中的一些具体制度设计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其中最受争议的就是 ISDS 机制。

然而 ISDS 机制在实践中一些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多数学者认为 ISDS 机制存在仲裁裁决不一致、程序缺乏透明度和损害东道国利益等机制自身缺陷，这些挑战亟待解决。而外部经济、政治和政策等因素的改变也推动着 ISDS 机制的改革发展。自 2006 年“国际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这一问题被提出以来，与 ISDS 机制研究相关的议题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

³ 殷嘉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19 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邮箱：qiqiyin0703@163.com

理论探索

论。尤其是近年来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欧盟加拿大全面经贸协定（CETA）、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将对国际经贸产生深远影响的协定，其公布文本投资章节中关于 ISDS 机制的改革方向不尽相同，更是将 ISDS 机制的改革这一议题推向白热化。

近年来，中国签订的 BIT 也都纳入了 ISDS 机制，并且全面接受了 ICSID 管辖权。而且，这几年间不断有涉及中国的投资争端被诉至 ICSID，例如伊佳兰公司诉中国仲裁案（2011）、平安集团诉比利时王国仲裁案（2012）、安城住宅产业有限公司诉中国仲裁案（2014）和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政府仲裁案（2014）。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以后类似的投资争议也将会不断地增加，为了给争端的解决提供建议，这就需要对 ISDS 机制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在此背景下，在阅读大量资料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本文以 Philip morris asia limited v.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案为例，通过对 ISDS 机制基本情况的介绍、ISDS 机制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及产生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并希望对我国投资协定的研究和发展有所启示和帮助。

二、文献综述

ISDS 机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诞生了，但我国学者真正开始研究该机制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新世纪，对 ISDS 机制的研究进入精细化发展的阶段 ISDS 机制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不少关于 ISDS 机制的专著出现，其中就包括陈安（2001）主编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机制研究》等。国外对 ISDS 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甚至可以说，国外 ISDS 机制的研究者，不少甚至近乎是 ISDS 的发明者。同国内研究轨迹一样，国外起初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 ICSID 中心和《ICSID 公约》这两个方面概括性论述。但是相比国内而言，国外早期的研究比国内学者研究的更深，如 Rudolf Dolzer、Christoph Schreuer（2012）的《国际投资法原则》中联系仲裁实践，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 ISDS 机制的争议焦点。还有 Susan Franck（2004）通过学术论文发表对 ISDS 的研究成果，Susan Franck 在对 ISDS 机制的研究中直指 ISDS 机制本身存在的缺点，但同时又坚决地支持 ISDS 机制作为解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的长期的有效性。ISDS 的研究学者不胜枚举，这些学者都对 ISDS 机制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ISDS 机制运用出现变化，一方面的原因是 ISDS 机制在实践的过程中弊端日益凸显出来。众所周知，设计 ISDS 最初的目的在于保护跨国投资者在东道主国家的利益，但从国际仲裁实践来看，ISDS 对东道国国家公共利益提出了挑战，由此引发了 ISDS 的热潮渐退和学者对

理论探索

ISDS 机制的广泛争议。学者 Barnali Choudhury 就曾提出 ISDS 机制会对国家事务管理产生影响。学者 David Collin(2009)也曾主张投资自由化不能牺牲国家的环境、劳工和文化等公共利益。学者于湛旻基于此,进一步指出要平衡公私利益,要对仲裁程序进行规范,从而加强对东道国公共利益的保护。

对于我国已经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 ISDS 机制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来说,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论述双边投资协定为基础,将 ISDS 机制作为投资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投资协定中的规则和机制作为并列的研究对象。如漆彤(2013)就是以我国三十多年的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为依据,在研究双边协定变迁时也对 ISDS 机制的变化做了一定分析。还如陈兆源(2015),则是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将双边投资协定中的 ISDS 机制中涉及到的规则予以分类归纳,并将相应影响因素赋予不同权值以此来提出完善的对策。

第二种是重点论述双边投资协定中所规定的某一种救济途径或者是某一规则的适用性问题。如余劲松、詹晓宁(2005),朱明新(2015),沈伟(2012),栗瑶(2015)等分别以国际仲裁的作用、ISDS 机制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程序性争端解决事项、协定中限定性的解决条款该如何理解和适用以及岔路口条款的分析等投资协定中涉及到的 ISDS 机制的不同方面为重点进行了研究。

第三种是对我国该如何完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 ISDS 机制有所涉及,如余劲松(2011)以怎样使投资者权益保护与维护东道国权威取得平衡为视角,从缔约国和仲裁机制两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还如陈辉萍(2007)结合美国多年来在双边投资协定中产生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解决的实践为借鉴,探讨了对我国进一步完善双边协定中 ISDS 机制的启示。

在国外研究方面,外国学者更多的是集中于对 ISDS 机制方面的研究且这些研究着重于技术性和专业性分析,或者着重于其他区域协定中的 ISDS 条款。如 Joachim Pohl(2012)对世界上的 1600 多个双边投资条约进行了统计调查,包括 ISDS 所规定的主要参数,并分析了 ISDS 在全球范围内规定差异性的原因。还如 NA Shanahan(2014)则关注了最近日益增多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仲裁案件及其整体性趋势,并对其中影响较大的 ISDS 焦点条款进行了剖析。再如 UNCTAD 于 2014[4]8 及 2015[2]4 发布的两份报告则对 2014 年发生的相关案件以及 2015 年的全球投资趋势进行了梳理,并指出目前世界上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正处于一个反思、审核和修订期,而投资争端解决是核心焦点,许多国家也在重新评估其立场态度,同时以理论和实践数据表明对 ISDS 亟需进行系统改革。

三、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概述

(一) 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产生背景

国际投资争端是指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所产生的不同国籍的投资者之间、国家之间、或国家与投资者之间因投资而引起的各类争议的总和。以主体不同为标准,可以将国际投资争端分为国家间的投资争端、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和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上述国际投资争端中,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通常可以通过谈判协商、斡旋调停、调查和解或者提交国际法院等国际公法上的政治方法解决,私人投资者之间则主要通过寻求国内法救济来解决投资争端,譬如协商、调解、民商事仲裁、国内法院司法诉讼等,但这些传统的争端解决办法却不足以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特别是二战以后,赢得独立的国家纷纷采取政治措施将殖民地国家建立企业收归国有,引起了大量的国际投资争端。在此背景下,为建立一条直接解决投资者和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的途径,以解决不断增加的国际投资争端,1965年3月18日在世界银行主导下通过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公约》(又称《华盛顿公约》),其目的是成立一个“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作为独立于世界银行的一个下属机构,以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国际投资争端,该公约于1966年10月4日生效。

此后,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东道主国家为吸引海外投资,纷纷制定相关投资政策保障海外私人投资者的利益,发达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国,在国际投资过程中为保护本国国民资金安全,在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是往往采用 ISDS 机制,使得私人投资者可以根据所签订的协议对东道主国际发起投资仲裁,以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利益。相较于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 机制在提起和审理过程中更为灵活,对减少国家与国家之间由投资引起的摩擦有明显改善,为私人投资者开辟了更多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渠道。

(二) 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内涵

1. 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概念界定

ISDS(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机制直译为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是一个解决私人投资者和东道国因国际投资产生纠纷的机制。关于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 ISDS 包括协商、调解、东道国当地救济、外交保护、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等,狭义上的 ISDS 机制仅指允许投资者直接对东道国政府起诉,争端由独立于东道国司法机构的仲裁机构来裁决案件的非政治化的单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本文所讨论的 ISDS 机制,均指狭义上的 ISDS 机制。

理论探索

2. 争端主体

国际投资争端又被称为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在这一争端关系中存在两方当事方，即私主体外国投资者、也被称为申请人和公主体东道国、也被称为被申请人。

(1) 投资者

在《华盛顿公约》第2章有关ICSID的管辖的规定中，第25条第2款对投资者的含义进行了规定。根据该款的规定，自然人、法人都属于“投资者”，但自然人投资者部分排除永久居民，并且对于国籍的情况有严格限制；此外，对于法人对于具有本国国籍的法人都被认为是缔约国国民，但是如果其受到外国控制，则不能认为是本国国民。

(2) 国家

《华盛顿公约》第2章有关ICSID的管辖的规定中，第25条第1款对国家进行了定义。在此款的规定中，本条约的缔约国或者缔约国派遣到“中心”的任何机构，都属于“投资者-国家”中所指涉的国家。

3. 投资争端

在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仲裁机制，投资定义为核心内容。多数双边投资协定都采用经典的标准型定义，在这种概念化的定义的基础上辅以列举式的投资定义。

《公约》第2章有关ICSID的管辖的规定中，第25条第2款对这一关联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本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只有直接由投资引起的争端才是“投资争端”中所指涉的争端，而其他的都不可以包括在内，当然更不可能寻求仲裁的救济了。

四、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

(一) 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现状

ICSID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间，自荷兰—印尼BIT以后，ISDS条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欢迎，逐渐被纳入投资协定之中，因此也就加强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可供ISDS机制发挥作用的舞台也就越来越多，这主要包括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1965）、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1966）特设法庭等。在这中间ICSID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处理了超过八成23的涉及ISDS机制的发生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案件。

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FDI）规模迅速增长，各类投资协定不断涌现，如1992年签署的NAFTA等。其后，ISDS被纳入BIT的进程与投资者母国不断加强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意识和行动相伴而行。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其签订各类与投资有关的条约中都包含有详细的投

理论探索

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条款。并且，美国先后于 2004 年和 2012 年修改推出了新版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用以指导其对外签订有关协定的实践，在范本中用近一半的篇幅来说明 ISDS 条款细则，可见美国对 ISDS 机制的重视程度。在 ISDS 条款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的大背景下，国际投资仲裁的作用大大增强，在此期间 ICSID 受理的 ISDS 案件大幅增加，达到了数百起之多。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贸发会，UNCTAD）2019 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⁴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底，各国间缔结的 BIT 总数累计达 2970 个，其中已生效的有 2367 个，有效的国际投资协定 2658 个。除此之外，全球签订的其他条约中包含投资条款的有 383 个，已生效的有 312 个。这些条约中绝大部分都包含了 ISDS 条款，详见图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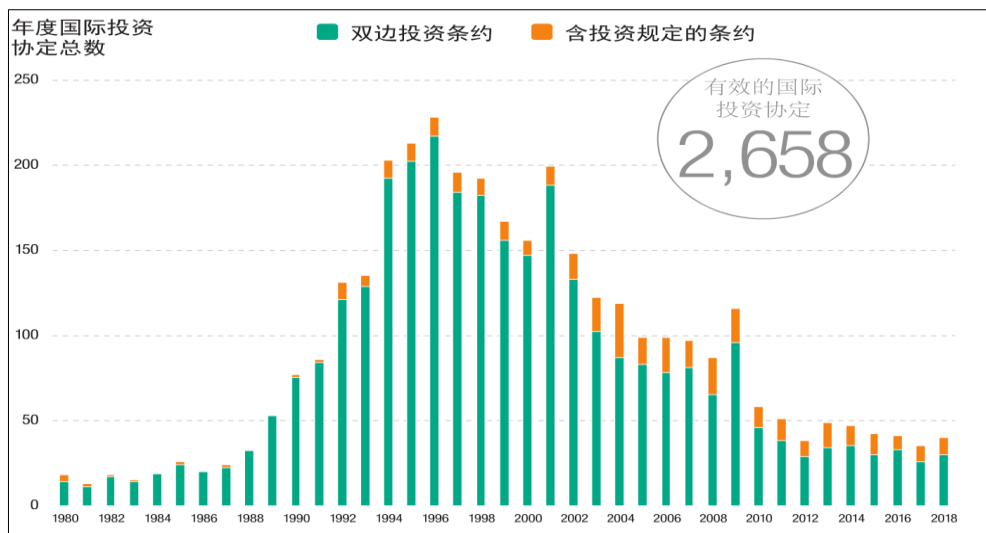


图 7-1 1980-2018 年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 UNCTAD 公布数据整理得出

1968 年荷兰—印尼双边投资协定是第一个纳入 ISDS 机制的双边协定，但根据 UNCTAD 数据统计，直至 1987 年才有第一个正式发起仲裁的 ISDS 案件，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 ISDS 案件只有寥寥数起。此后随着国际投资的兴起，ISDS 案件数量激增。95 年代后期至 2017 年，ISDS 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虽偶有几年有所回落，但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 2015 年一年，提起仲裁的 ISDS 案件就有 82 起。但这样的情景在 2018 年却有所改变，2018 年 ISDS 案件总量相较之前明显减少，仅有 37 起，究其原因，虽与数据更新时间直接相关，但不可否认 ISDS 机制的反向运动也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截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开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诉讼总数达 942 起。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已知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案

⁴由于在撰写本文时《世界投资报告（2020）》还未公布，因此只能用《世界投资报告（2019）》中提供的截至到 2018 年底的数据。

理论探索

例都是基于老一代投资条约。目前有 117 个国家是一项或多项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诉讼中的被告方。2018 年公布的仲裁裁决中，超过三分之二或是基于管辖理由或是由于案情裁定投资者获胜。截至年底，602 项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诉讼已经结束，详见图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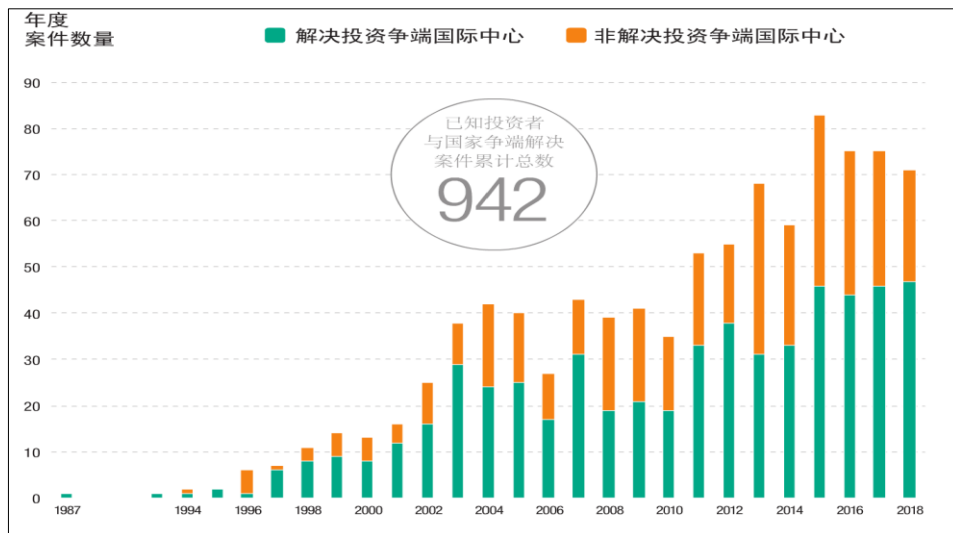


图 7-1 1987-2018 年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已知案件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 UNCTAD 公布数据整理得出

(二) 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实践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通过前文梳理可知，不可否认 ISDS 机制曾为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在如今的国际投资条约中仍保持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但随着随着国际投资的蓬勃兴起与国际投资协定数量的激增，大量 ISDS 案件的审理使得 ISDS 机制固有缺陷不断凸显，其在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包括仲裁程序缺乏透明度、损害东道国利益和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

1. 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性

仲裁裁决不一致的表现

裁决与裁决之间经常表现出来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由一样或者差不多的文字叙述呈现出的文本或被不一样的仲裁庭做出差别很大甚至完全相矛盾的解读，比如同样的投资协定文本，在不同的仲裁庭经过不同的仲裁员的解释，最终的解释可能天差地别，很不一样；另一方面，同样的或者差不多的文字所呈现出的一样的或者差不多的权利可能会被仲裁庭做出差别很大甚至完全相矛盾的解读，比如，在两个案情基本一样、争端所涉及的权利在文本的表述中也差不多的案子，在不同的仲裁庭进行审理的情况下，最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裁决。这使得裁决的公信力遭受到严重质疑。

仲裁裁决不一致的原因

针对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性，分析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情形：

理论探索

第一、缺乏统一的投资仲裁法律解释制度。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投资仲裁法律解释制度，这也就使仲裁员在对投资条约中实体法规则的模糊的地方进行解释的时候获得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有的甚至进行随意解释。由于不同的仲裁员之间价值观念、教育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的不同，

第二，管辖权的扩张以及没有建立合并审理制度。一国政府的某一个涉及投资的抽象行政行为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行为对象（投资者），这一个行为可能会导致这些人同时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然后这些遭受损失的人可能会各自分别将国家的这一行为为提请仲裁，要求赔偿，原因是这个国家违反了条约义务，侵犯了他们依照条约应享有的权益。然后仲裁庭就会分别独自进行审理。这些损失大小有不同，类型可能也有不同，但是它们都指向同一个行为，处罚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仲裁程序的秘密性特点很容易造成这些仲裁裁决结果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

2. 仲裁程序透明度的缺乏

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 ISDS 机制仲裁程序脱胎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同样严格遵循保密原则，非经当事方同意不能公开有关事项和资料，因此也就存在仲裁程序透明度缺乏的问题。下面以 ICSID 为例进行说明。

（1）仲裁程序透明度的缺乏的原因

ICSID 仲裁建立时借鉴了传统商事仲裁的许多程序性事项，比如仲裁程序的保密原则。秘密性要求仲裁过程、期间产生的所有文件都要保密，导致几乎所有与投资仲裁有关的事项都不能对外公开，因此也就不为当事方以外的其他人和社会组织所知晓，东道国的普通百姓更是无从知晓。

（2）仲裁程序透明度的缺乏的危害

ICSID 仲裁的对象是普通异国投资者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因投资争议而引发的争端。但是一般情况下涉案的一国政府的行政行为通常是针对社会的管理行为，而这一公共管理行为往往涉及重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然而由于仲裁的秘密性，因此导致与此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普通老百姓和反映他们利益诉求的社会组织通常都没有任何途径可以知道仲裁的内容，无法及时维护他们依法应得到的权益。

另外，由于程序缺乏透明度，一般人可能会对案件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性怀疑，比如对案件程序是否公正、准据法的选择、双方是否有暗箱操作等方面都会产生质疑。这些都会影响到裁决的公信力，进而影响到仲裁本身的公信力，这个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3.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权益失衡

(1) 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权益失衡的表现

在 ISDS 机制中, 诉诸 ICSID 进行仲裁基本是投资争端解决的最主要的途径。而 ICSID 则继承了传统商事仲裁注重保护私人财产利益的价值取向, 仲裁庭倾向于保护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私人投资者的利益, 容易忽视多为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的指引下, 仲裁庭往往在利益平衡的天平上往私人投资者一方增添砝码, 最终导致平衡双方利益的天平失衡倒向投资者一边, 使天平的另一方—东道国被迫承受利益失衡的后果比如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或者被迫取消某些关于环境保护、公共健康、人权保护、劳工待遇及调整经济结构等方面法律法规等等后果。甚至有时为了避免支付巨额赔偿而主动取消某个行政措施或者法案, 进而导致一国公共管理行为遭受严重的挑战, 国家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遭遇严重损失。

(2) 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权益失衡的原因

这种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的失衡的现状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一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与投资仲裁有关的制度内容差不多全部出自于世界银行的资本家们之手, 而他们正是这些投资者的代表, 这也就注定了私人投资者保护的倾向和忽视东道国权益的倾向。这是体制方面导致双方利益失衡的原因。

二是由于仲裁程序的保密性。秘密性要求仲裁过程、期间产生的所有文件都要保密, 导致几乎所有与投资仲裁有关的事项都不能对外公开, 因此也就不为当事方以外的其他人和社会组织所知晓。其他个人或者社会组织必能参与到仲裁程序中, 也就无法及时将自身遭受到侵害的利益反映出来, 在利益平衡的天平上的己方增添砝码, 从而达到平衡彼此间的利益。

4.案例分析——Philip morris asia limited v.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案

(1) 案件历史和背景

Philip Morris Asia 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根据 UNCITRAL 规则向澳大利亚提出仲裁索赔, 认为澳大利亚的香烟简易包装法违反了澳大利亚根据 1993 年香港和澳大利亚政府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澳大利亚——香港 BIT) 作出的承诺。

在一系列的索赔中, Philip Morris Asia 认为, 澳大利亚 2011 年的“简易包装法”是违反澳大利亚香港 BIT 第 6 条的非法征用(unlawful expropriation)。此外, Philip Morris Asia 认为这一立法侵犯了澳大利第 2 条第 2 款作出的承诺: (1) “简易包装法”未能给予该公司的投资以公平公正的待遇; (2) 这样的立法也构成了不合理的歧视性措施, 剥夺了对该公司投资的全面的保护和安全。澳大利亚拒绝了所有这些索赔, 认为仲裁庭没有管辖权,

理论探索

索赔要求也没有受理性。Philip Morris 的公司总部并不像其他烟草公司那样通过澳大利亚国内法院寻求赔偿，而是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在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打算在香烟简易包装上引入法案之后，Philip Morris 国际公司安排了其全资香港子公司 Philip Morris Asia，收购其它两家 Philip Morris 澳大利亚子公司 Philip Morris Australia Limited 和 Philip Morris Limited。然后于 2011 年 6 月，Philip Morris Asia 提出根据澳大利亚——香港 BIT 下友好解决的索赔。在与澳大利亚政府谈判失败之后，根据 UNCITRAL 规则提交了正式的仲裁请求。

第一次程序会议于 2012 年 7 月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三人专案仲裁庭。澳大利亚认为，澳大利亚——香港 BIT 第 10 条不给予仲裁庭以管辖权，来主持由双方之前的争端“重新包装”成为的 BIT 争端索赔。澳大利亚政府还认为，简易包装政策并不违反 BIT 规定的保护条款，因为 Philip Morris 收购了在 Philip Morris Australia 的股份，而后者充分了解澳大利亚打算实施简易包装的情况。新加坡仲裁庭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驳回了此案，支持澳大利亚的立场，即法庭没有管辖权，也不可以受理 Philip Morris 的索赔。

（2）ISDS 破坏政府管制和违反主权豁免的权利

主权豁免是国家为了人民或环境的健康和而制定法律的主权能力，包括政府有权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健康和福利。Philip Morris 案一出现，专家就开始提及此案件与之前引起广泛关注的 Vattenfall I 案相同，并就 ISDS 机制对主权豁免特别是国家管制权利带来的挑战提出了公开的对话。

ISDS 的反对者声称，ISDS 所支持的离岸投资仲裁庭是由一群与跨国公司密切合作并延续其利益的私人仲裁员组成。此做法赋予公司起诉国家特殊的合法权利，而受外国公司影响的政府不能提出任何要求，绕过国内法院并私下执行投资协议的条款。

此外，私人投资仲裁法庭正在讨论有关公共健康、安全、环境的重要公共问题。其对于香烟的简易包装规则、毒品禁令、自然资源政策、健康和安全措施的决定以及拒绝发放有毒废物堆放许可证的决定最终的，不能在上级法院受到质疑。为保护各国利益而制定的法律在一个不透明的平台上受到了挑战。由于投资者正在取消法院通常所能提供的程序性保护，而采用不负责任的、不可审查的裁决制度，所以其法治也被削弱了。

相类似的，一些反对者指出了对政府“管制冰封”的担忧：政策制定者会因为担心投资者可能会起诉政府违反 BIT 的义务，从而降低投资价值，而不愿意引入新的规定。国家将参与长时间的诉讼，而且法庭一旦裁决给予投资者赔偿，将会给政府带来巨额的财政成本。

事实上，新西兰卫生部于 2013 年 2 月宣布政府计划推出自己的简易包装法，但要等到

理论探索

Phillip Morris 案得到解决，故新西兰立法的颁布出现延迟。

（3）Phillip Morris 案的影响

一直以来，政府为了健康目的而出台反烟草立法，其正当性是根本无需讨论的，Phillip Morris 案可谓彻底挑战了人们的这一认识。东道国政府在制定社会福利、环保法规时，为避免被外国投资者以侵害其投资权利为由交付仲裁主张巨额赔偿的风险，有可能选择放弃制定此类法规，形成寒蝉效应，导致环保政策空间缩减，由此带来的影响难以估计。即使 ISDS 仲裁的最终结果是投资者败诉，在客观上也推迟了东道国甚至其他国家相关法规的出台时间。

五、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建议

（一）构建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增强裁判一致性

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有利于使得通过 ISDS 机制仲裁所作出的裁决的实体内容能获得更好监督，提高裁决的一致性、连贯性。首先，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通过对上诉的机构人员组成和程序进行规定，使仲裁人员队伍保持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稳定，使其教育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不至于差别过大，从而使其不会做出差异过大的裁决。

其次，通过建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可以从制度上更好地维护东道国的利益。而上诉机制的构建会使裁决重新衡量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与东道国的公共利益，维护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另外，裁决的一致性也使结果的可预见性大大增加，也更能预见自身行为的国际法层面的合法性，结果的可预见性使当事人能够更好地采取应对措施维护自身的权益。

尽管增设上诉机制很可能带来降低效率、增加当事人负担等问题，但是由于其在保障仲裁裁决一致性和准确性方面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上诉机制改革的倡议和方案层出不穷。例如，《欧加自贸协定》就为将来建立上诉机构做了明确的规定，赋予争端解决委员会是否需要设立上诉机构的权利。《跨大西洋协定》欧盟草案则就建立上诉机构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在投资章节相关条款中明确规定了上诉机构仲裁员的组成、任期、审查范围等内容。

（二）提高投资仲裁程序的透明度

关于仲裁程序的透明度的解释问题，目前国际社会尚未达成一致。就其法律含义而言，主要倾向于公众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认为，透明度涉及四个方面的程序规定：（1）公众对仲裁程序知晓；（2）对文件的获取；（3）公开听证会；（4）法庭之友陈述书的提交。在改革仲裁一致性的同时，也力图完善其他程序性的规定，提高程序透明度，从而保障仲裁裁决的公正性。

理论探索

首先，针对公众参与权，应扩大进入仲裁程序的主体范围。公众参与权对程序透明度的意义在于，若不能保障所有权益因投资争端受到显著影响的主体完全地参与仲裁庭审的过程，具体而言这些程序包括获得和知悉程序文件、独立提交证据、参与仲裁庭审独立提出在法律和事实方面的意见，那么便不可称之为一个公平的程序。^[21]在一个不充分、不透明的程序中得出的仲裁裁决很可能是错误的。

其次，通过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旨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程序透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最后，还应将投资建立公开的投资仲裁案件数据库。虽然 ICSID 也有案件数据库，但是其公开是有限制的，即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才能公开裁决全文。

（三）重视保护东道国主权

ISDS 限制了东道国实施必要的监管权是 ISDS 急需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ISDS 制度对东道国主权的限制是过去的投资协定在起草文本时的失误——将保护投资作为主要目的，而不考虑可能对一国监管权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国际投资协定产生和签订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保证国家遵守东道国的义务，但并没有也不能剥夺东道国在适当情况下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社会公益的权力。

因此，在未来的制度完善中，应逐步扭转失衡的国际投资协定，强调东道国规制权及投资者责任。逐步完善嵌入式自由主义范式的 BIT，更为追求促进投资自由化、保护投资者利益与保障东道国国内监管权的平衡。更加注重东道国在国家安全、金融稳定、环境保护、劳工保障等重要公共政策领域所保有的适当监管空间。

六、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发展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自 1984 年签订首个包含 ISDS 机制的中法 BIT，ISDS 机制在我国投资领域已有 30 余年的发展历史，从最初以本国当地救济为主只接受涉及征收和国有化补偿的投资纠纷提交 ISDS 机制仲裁，到逐步接受 ICSID 管辖，再到穷尽国内救济的前提下全面接受 ICSID 管辖，ISDS 机制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由此可见我国对 ISDS 机制总体持积极态度，ISDS 机制是我国解决投资者-国家争端的重要途径。而中国作为东道国第一次真正参与 ISDS 仲裁审理则是在 2011 年，伊桂兰公司诉中国政府一案中。此前中国政府虽早已签订大量包含 ISDS 机制的 BIT，但由于我国对适用 ISDS 机制的态度审慎，使得我国的 ISDS 机制始终停留在静态的理论阶段，直至近几年对 ISDS 机制适用范围的逐渐放宽，我国投资者也越来越有国际法层面的维权意识，ISDS 机制中的涉华案例才逐渐增多，我国的 ISDS 机制也终于从静态阶段向动态阶段过渡。这些不断丰富的涉华案例也将为我国 ISDS 机制改革提供了实践指导，使其

理论探索

沿着更适合我国发展需要的方向不断完善。

（一）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区分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展，但从 ISDS 机制的实践新趋势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争议引起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家经济与民生、环境等应同步发展，密不可分。且这一发展趋势是大势所趋，国家为此做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因此，为了保护投资的同时，中国应谨防因为社会发展进行的政策调整被诉，在今后的 BIT 签订与更新中，我国应对 ISDS 机制进行设计来强调可持续发展原则，一方面要强调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同时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我们要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区分。就目前而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中间签订的 BIT 中，相对处于弱势，因此发达国家在与我国之间签订的 BIT 中也倾向于纳入 ISDS 机制，虽然由于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双向资本流动，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但是我们仍然要谨防发达国家通过 ISDS 机制挑战我国的国家规制权，在签订和更新 ISDS 机制时宜采取保守战略，对于重大安全事项要坚持保留。同时我们对这一机制也应该有信心，因为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投资的增多，未来这一机制也将对我们国外投资进行保护，我国对此应有长远目光。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与他们之间的投资基本是单向性的，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的投资免受东道国的政策风险，在与这些国家的 BIT 中可以适当将权利让渡与仲裁庭来解决。

（二）探索新机制规制仲裁庭解释权

从案例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 ISDS 机制争议的法律问题大多是由于法律解释造成的，正如前文提出的，仲裁程序的弊端使得仲裁在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与投资者利益抉择之间存在一定的倾向性，使得 ISDS 机制饱受质疑。因此，为了限制仲裁庭的解释权，我国可以借鉴目前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在仲裁程序上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借鉴最近欧盟关于建立“投资法庭”的提案中的一些做法，尽可能使法庭化管理仲裁员。同时通过权威条约解释机构的逐步建立来限制仲裁庭的解释权，并尽可能的积极探索新机制来多元化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端。

（三）积极开展 BIT、MAI 谈判

现阶段应主要通过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 BIT、MAI 谈判，来探索、试验、改进我国提出的关于 ISDS 机制改革的方案。鉴于 MAI 涉及国家众多，牵连利益巨大，其谈判的复杂和艰

理论探索

巨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可以先从 BIT 入手，随后扩展至多边投资协议谈判，逐步掌握 ISDS 机制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 BIT 和中-欧 BIT 的谈判可以说是中国 ISDS 机制改革的重大契机。这两个 BIT 的签订主体是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一旦完成谈判将对全球的投资规则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可能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BIT 的签订范本。因此中国应在此时积极争取在这两个 BIT 的谈判中 ISDS 机制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力求将 ISDS 机制改革的中国方案渗入中-美 BIT 和中-欧 BIT。中国更适合以温和的方式对 ISDS 机制进行改革，所以在 BIT 谈判过程中，中国可以借鉴 TPP 对 ISDS 机制的改革方式，对原有 ISDS 机制简单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具体包括受案范围、前置程序、透明度规则、仲裁员选任、审理期限等，暂时可以不考虑建立上诉机制，而是在附件中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缔约方一起探索建立上诉机制的可能，并预留建立上诉机制后与现有规则的衔接条款。除新 BIT 的谈判之外，我国也该将原来签订的 BIT 的优化升级谈判提上 ISDS 机制改革日程，提高整个 ISDS 机制的协调一致性和可持续性。

七、结语

在国际法上，ISDS 机制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有效机制。ISDS 机制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 ISDS 机制源自传统的商事仲裁，其机制在适用是本身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弊端也显露的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东道国国家管制权的挑战和对国内法的挑战，使得不少国家对 ISDS 机制运用态度转变。

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仲裁裁决不一致、投资争端仲裁程序缺乏透明度以及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利益失衡等。在分析国际社会克服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主要问题的实践的基础上，笔者就解决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包括构建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增强裁判一致性、提高投资仲裁程序的透明度、重视保护东道国主权等。最后，对中国缔结有关投资条约时的相关考量提出了建议：首先，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区分，审慎应对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建，探索新机制规制仲裁庭解释权，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其中，在构建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本国的利益，这也符合中国同时作为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双重身份的利益需求。更好地促进本国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企业走出去。更应通过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 BIT、MAI 谈判，来探索、试验、改进我国提出的关于 ISDS 机制改革的方案。

理论探索

现在,“一带一路”倡议规划是新时期中国大国崛起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家复兴的关键。在这项战略中,中国资本走向沿线各国各地区、进而走向全世界,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扩展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投资者不可避免地要和当地政府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严重时可能导致投资争端的出现,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善用国际规则,要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时 ISDS 机制就会显得十分重要,也必将成为中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另外,目前中美、中欧 BIT 都处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具体结果如何,现在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将有更多的美式 BIT 的规则和原则被吸收进中国对外所签订的 BITs 之中,在这方面两国将会相向而行,这一点从几年前签订的中加 BIT 中就可略知一二。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也与我国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规模相称,同时有利于维护各方利益平衡,促进对内和对外投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Choudhury B.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arising from the intersection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human rights,” *Alta. L. Rev.*, 2008, 46: 983.
2. 陈兆源,田野等:《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 1982—2013 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3 期,第 122-148 页。
3. 陈辉萍:《美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晚近发展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07 年第 14(3)期,第 108 页。
4. Dolzer R, Schreuer 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5. David Collin.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2009(08).
6. David Gaukrodger, Kathryn Gordo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 scoping paper for the investment policy community,”.2012.
7. Franck S D.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Fordham L. Rev.*, 2004, 73: 1521.
8. Gus Van Harten A report on the flawed proposals for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in TTIP and CETA, <http://ssrn.Com/abstract=2595189>. Feb. 12, 2018.
9. Investment Policy Hub, <https://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

理论探索

10. Investor to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Some facts and figures[EB/OL] . [2015-03-12].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january/tradoc_153046.pdf.
11. 栗瑶:《投资条约中岔路口条款的适用分析——以 Pantechniki v. Albania 案例》,载《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04期,第136页。
12. Lise Johnson,Lisa Sachs and Jeffrey Sachs,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Public Interest and U.S.Domestic Law[N], CCSI Policy Paper ,May 2015.
13. 孟凡娟:《ISDS 的检视及适用》,载《中国商论》,2016年第2期,第161-164页。
14. NAFTA FTC: Settlement of FTC on Non-Disputing Party Submissions [EB/OL].<http://www.international.gc.ca/NAFTA-alena/Non-Disputing-en.pdf>. 2016-11-18.
15. Pohl J, Mashigo K L, Nohen A. “Dispute settlement pro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large sample survey,” 2012.
16. 漆彤, 聂晶晶:《论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模式变迁》,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3年第1期,第222-240页。
17. 沈伟:《论中国双边投资协定中限制性投资争端解决条款的解释和适用》,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第1046-1068页。
18. Shanahan N A. The Changing Face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An Analysis of Factors Driving Trend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WTO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J]. Available at SSRN 2438955,2014.
19. 投资协定动态 2015 年 2 月期[EB/OL]. [2015-03-0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f444d0102vbc.html
20. 徐海兰.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研究[D]. 安徽大学,2010.
21. 余劲松,詹晓宁:《论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影响》,载《第 22 届世界法律大会》,2009年,第513-518页。
22. 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132-143页。
23. 朱明新:《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表象与实质——基于条约解释的视角》,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2(3)期,第171-183页。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7)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25. 张贤达:《我国自贸区临时仲裁制度的构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25(3)期,第

理论探索

160-170 页。

26. 孙英哲：《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发展趋势研究——以 CETA 投资章节为视角》，载《经济问题》，2018 年第 4 期，第 111-115 页。
27. 刘瑛：《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海外研究综述》，载《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第 13-24 页。
28. 张生：《CPTPP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与中国的对策》，载《国际经贸探索》，2018 年第 34(12) 期，第 95-106 页。

第八章 新时期欧盟贸易政策发展趋势

肖书越⁵

【摘要】《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贸易政策制定框架发生了显著变化，贸易政策越来越集中体现欧盟整体政治经济诉求。这一时期的政策导向特点鲜明且富于调整，紧扣变化多端的全球化局势：首先，欧盟对 WTO 的改革方案折射出对多边自贸体系的捍卫以及重塑全球秩序，确立自身优势的渴望。其次，近年来欧盟谈判或签署的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既是对多边协商机制缺陷的补充，也存在重要的地缘政治考量。最后，2020 年初的全球疫情是对欧盟新自由主义基因的试炼，身处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岔路口，欧盟面临重大抉择。本文以《里斯本条约》生效、WTO 改革、双边贸易协定政治化以及新冠疫情几个重要事件或现象为节点，梳理新时期欧盟贸易政策发展趋势，以期为更全面地理解这一趋势提供一个多样化的视角。

【关键词】 欧盟贸易政策；多边贸易体系；自由贸易；政治化；保护主义

一、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发生了三轮结构性演变：贸易的“服务化”，企业价值链的全球化以及商品与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过去 20 年的一系列国际贸易协定折射出了这些变化 (Leblond, Viju-Miljusevic, 2019)。作为拥有庞大市场，推崇自由贸易的区域性经济体，欧盟贸易政策的发展也不断适应新的形势。

21 世纪的全球贸易机遇与挑战并存。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并从中获益的同时，欧盟也在积极寻求对全球经贸体系的重塑，以期确立自身优势地位，对外输出规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盟是自由贸易的有力维护者与建设者，其成员国领先世界的政治经济地位也赋予其在国际经贸舞台上强大的议价能力。然而近年来，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全球价值链的转移调整，以及欧美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欧盟的贸易政策路线也出现了波动。总的说来，在大体秉承新自由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原则不变的前提下，欧盟的贸易政策制定受内部民情影响而渐趋政治化，受自身利益驱动而渐趋隐形保护主义。其中，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的博弈是重要的分析依据 (王宏禹, 严展宇, 2018)，政治与战略因素的权衡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而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或会预示贸易政策新的走向。

本文拟对《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的新时期欧盟贸易政策发展趋势加以梳理，主要讨论政策路线的突出特征。具体而言，《里斯本条约》导致了欧盟共同贸易政策制定领域决策主体的变化，自此，欧盟的对外贸易协定谈判过程出现了一系列策略调整，这在欧盟推进 WTO

⁵ 肖书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化营销与国际经济。(北京，100089)
联系方式：198-0110-2861 (手机) xiaoshuyue@bfsu.edu.cn (邮箱)

理论探索

改革以及与发达或新兴经济体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时都有体现。此外，新时期欧盟内部一体化进程屡掀波澜。难民问题招致的公众不满与英国脱欧的政治阴云之下，民族国家化倾向愈演愈烈。公共领域空前活跃的民情民意同样影响到了欧盟的贸易政策，后者表现出西方学者所说的政治化特征。而在最近，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令各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损失惨重，危机中的欧盟如何挽救经贸形势也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之一。通过对上述议题的分析梳理，本文希望为认识新时期欧盟贸易政策发展趋势提供一个多样化的视角。

二、文献综述

有关欧盟贸易政策的研究非常丰富，其中大多数国内文献是针对某一特定政策内容、工具或驱动力展开的探讨。例如“管理全球化”战略（王展鹏，夏添，2018），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的博弈（王宏禹，严展宇，2018），欧盟对外贸易政策中的人权条款（蒋小红，2016），日欧经济协定的技术细节（漆彤，窦云蔚，2018），中欧外商投资标准对比（屠新泉，曹鸿宇，2019）等等。对于欧盟贸易政策做整体性梳理的研究很少，现有的往往也是从具体政策做法的角度论述（牟岚，2014）。而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跳出细节剖析，从宏观角度来把握近年来的欧盟贸易政策。

此外，国外学术界目前热火朝天的一些研究话题在国内还缺乏讨论，代表之一就是欧盟贸易的政治化趋势。诚然，西方学者对该话题的探讨已经比较全面（Leblond, Viju-Miljusevic, 2019; Young, 2019; Meunier, Czesana, 2019; Meunier, Nicolaidis, 2019），但也有必要将有关成果加以提取呈现，增进我们的理解。本文在这方面做了一部分浅薄的工作。

与此同时，欧盟贸易政策也受到新情况的影响，那便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有关疫情给贸易带来的得失，欧盟内部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展开了热烈而具有启发性的讨论，但国内对此的探索还有所滞后。本文结合时下形势，试图梳理有关意见，对疫情下欧盟贸易政策的走向稍作阐释，以期为欧盟贸易政策研究提供一点新的内容和思路。

三、新时期欧盟贸易政策发展趋势分析

本部分首先介绍以《里斯本条约》为代表的制度改革对欧盟贸易政策的影响，然后论述欧盟参与WTO多边谈判、推进WTO改革的贸易主张。接下来将讨论近年来贸易政策政治化带来的策略调整。最后简要探究全球疫情下欧盟贸易领域可能的政策应对。

1. 制度改革对欧盟贸易政策的影响

《里斯本条约》深刻影响了欧盟的贸易政策制定。前“里斯本”时代，欧盟贸易的实际

理论探索

决策者并非反映民意的欧洲议会，而是贸易领域的专家精英。成员国与欧盟在贸易领域的权责不清也阻碍了统一贸易政策的推行（王宏禹，严展宇，2018）。

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贸易政策开始服务于外部行动，欧盟对外贸易必须遵循民主，法治，人权以及自然资源可持续的原则，因而加强了规范输出，而不再只着眼于单纯的经济自由化。并且，对外贸易中包括知识产权与外商投资在内的各个商品服务领域都需首先经欧洲理事会投票决议，然后才能纳入国际贸易协定谈判文本。同时，贸易领域的权责划分逐渐明晰，成员国的主权逐渐让渡于欧洲议会，赋予其在欧盟外部政策制定上更为重要的角色（Leblond, Viju-Miljusevic, 2019）。

随着欧洲议会成为欧盟贸易领域的圈内人，欧盟贸易政策以及谈判活动一改先前在民众当中的少人问津，而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普通大众视野。民意诉求对欧盟贸易政策的影响力日增，但同时欧盟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地位又便利了共同政策的落地和规范化议题的推行。由此带来的内部角力与效果外溢是可想而知的。

2. 欧盟 WTO 改革方案折射出的贸易政策倾向

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的多边贸易体系令成员国享受到了国际贸易的红利。然而，随着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兴起，WTO的规则秩序蒙受质疑，批评乃至破坏，多边贸易体系濒临瘫痪。当前，WTO的改革与重振成为关键议题。

欧盟一直积极参与WTO事务，在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也曾贡献出自己的方案。综合来看，欧盟支持推进WTO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诉求（石岩，2019）：

拯救濒于瘫痪的多边贸易体系，维护有利于己的外部贸易环境。欧盟对外贸依存程度极高，进出口均依赖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重重考验，维系欧盟内部经济与就业稳定成为当务之急。贸易部门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承受不起多边贸易秩序紊乱和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冲击。

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在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确立优势。新兴市场国家的奋起直追令欧盟深感不安，贸易伙伴综合国力的增强也相对削弱了欧盟的议价能力。欧盟在2017年发布的《驾驭全球化反思报告》和《以平衡渐进的贸易政策驾驭全球化》中指出，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是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诱因（European Commission, 2017）。为了保障欧盟内外安宁稳定，从贸易入手或可一箭双雕。近年来，欧盟倡导贸易协定规范化，实则带有输出欧盟规则，增加协定条款，给贸易伙伴设限的考量；同时呼吁维护贸易协定平衡，矛头直指贸易中的不公平行为。结合欧盟对新兴市场国家事关贸易公平的控诉和调查，不难发现，国际贸易竞争压力日增的欧盟迫切希望推广有利自身的游戏规则，奠定自己的优势地位。

理论探索

主张由多边谈判转向诸边或双边谈判，以期提高贸易谈判效率。在耗时长达一年的多哈回合谈判中，欧盟主张将政府采购透明化、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保护等非贸易事项纳入谈判进程，并试图推进社会、环境问题与贸易政策对接（王展鹏，夏添，2018）。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上述议题激烈反对，他们针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关切也未得到解决，多哈回合最终陷入停滞。究其原因，WTO 决策机制的“协商一致”和“一揽子承诺”原则压缩了多边谈判的空间。协商一致意为只要没有 WTO 成员正式提出反对意见，该项提议即获通过。缺席或弃权本身被推定为同意，并不影响共识的达成（谭观福，2019）。虽说该原则保证了贸易小国的存在感，但贸易大国与小国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力并不均等，存在势力操纵的空间。一揽子承诺原则要求成员国一次性对所有议题进行协商，如若接受就必须全盘通过，否则只有砍掉意见不统一的议题，将包裹越打越小。该原则在防范贸易碎片化和搭便车问题的同时，也增加了 WTO 成员讨价还价的成本。并且，无法取得共识从而被迫剔除的议题可能恰恰是某些成员的重点关注领域，正如欧盟在多哈回合中的窘境所示。出于以上原因，多边谈判机制效率较低，已经陷入僵局。相反，诸边或双边协商谈判以其诉求集中、规则灵活等特点，可以成为多边体系的有益补充。尤其在一对一谈判当中，欧盟更能发挥自己的议价能力。双边贸易协定的确是欧盟深入耕耘的方向，取得了大量成果。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将在第三节予以说明。

综合以上诉求，欧盟关于 WTO 现代化的《概念性文件》（European Commission, 2018）提出了对 WTO 的改革主张，主要讨论三个议题：（1）规则制定与发展；（2）日常工作与透明度；（3）争端解决机制。综观该文件，欧盟的改革方案主要针对“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做法”。一方面，欧盟力主拯救争端解决机构，稳定多边贸易体系，以期突破美国蓄意破坏造成的困局。另一方面，欧盟力主解决国有企业、政府补贴、服务与投资壁垒、强制技术转让、外国投资者歧视性待遇和边境后扭曲等问题，矛头直指新兴市场国家。总的来说，欧盟改革方案折射出的贸易政策倾向体现了对规则的强化，对贸易伙伴的约束与审视，以及对重塑多边贸易秩序以建立自身优势的强烈愿望。

3. 欧盟贸易政策的政治化

近二十年来，欧盟积极推进双边贸易谈判，深度参与 WTO 协商，不断拓宽贸易协定的谈判范围，将众多非贸易议题如监管合作，环境与劳工标准，人权问题等纳入其中。欧盟贸易协定的综合性反映了同时也加强了公众的关切。政治家，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大众关心成员国是否能根据民主原则与进程调控经济社会发展，担忧新的贸易协定会赋予商业部门远超以往的特权，进而放大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冲击（Leblond, 2019）。贸易议题政治化程度明显，成

理论探索

为近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

2014 年来，欧盟民众爆发了几轮强烈抵制运动，针对的是欧盟与美国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以及与加拿大的《欧盟—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CETA)。环境保护组织与公民社会团体是抗议浪潮的领军力量。在声讨 TTIP 的运动中，民众担心该贸易协定将赋予大型跨国公司绝对优势，牺牲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损害公共服务业和农业。环境保护组织尤其忧心美国加拿大向欧盟大量倾倒转基因食品和污染环境的压裂气，危害公众健康，拉低环保标准。民意与欧盟委员会的角力结果是，CETA 最终艰难获批，TTIP 的谈判则于 2016 年陷入停滞。尽管 2018 年特朗普与容克的会面显示 TTIP 谈判重启，昔日阴霾依然如故。

TTIP 与 CETA 的遭遇引发了学者们对贸易领域政治化的广泛讨论。然而，贸易政治化实非新事，上世纪 90 年代的欧盟也曾出现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反贸易运动。再者，抵制 TTIP 和 CETA 并不等同于公开叫板全球化与自由贸易。诚然，近些年来欧洲民粹主义崛起，在部分欧盟国家内部政治声望日盛，但民粹主义政党抨击的对象更多是移民与劳工问题，而非自由贸易 (Young, 2019)。并且，与上述两个协定几乎同一时期进行的欧盟—日本自贸协定谈判以及后来的欧盟—越南与欧盟—新加坡贸易谈判在公众之间均未能溅起多少水花。由此可见，当前欧盟贸易政治化程度根据贸易协定和贸易伙伴的不同而高低有别。有学者指出，TTIP 与 CETA 所遭遇的巨大民众阻力不仅关乎不同游说团体的利益博弈（大型企业 vs 中小型企业 vs 工会组织 vs 环境保护组织），还牵涉到欧盟民众与美国加拿大人民的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之争 (Duina, 2019)。冲突既体现在特定商品服务的技术性条例层面，同时也折射出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对立。TTIP 与 CETA 的技术内容因而被赋予了重要的象征意义，使得包括欧盟、非政府组织、民族政党、成员国政府、商业联盟、公民社会团体在内的多个实体竞相采取行动，试图影响与左右有关谈判。

在此过程中，欧盟贸易政策也出现了有趣的动向。一方面，为回应愈演愈烈的贸易政治化，欧盟委员会相继出台“惠及所有人的贸易：迈向更负责的贸易与投资政策”战略文件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以及“驾驭全球化反思报告”(European Commission, 2017)，推崇“平衡渐进”的贸易政策，即把握全球化机遇的同时规避风险。这一官方话语看似是为缓和与政治化带来的冲突对立，然而在某些学者看来 (Young, 2019)，“平衡渐进”政策谈论的是全球化整体而非招致强烈民意反弹的个案，某种程度上存在错误解读政治化缘由和公众关切的嫌疑。如前所述，贸易议题剧增的公众显著度不完全等同于对全球化本身的敌意，欧盟对形势的判断似乎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但无论如何，欧盟表现出的官方立场是尽量缓和

理论探索

政治化。然而另一方面，欧盟贸易政策却越来越政治化。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欧盟进行贸易谈判时倾向于运用非贸易条款输出规则，并借以惩罚或制裁在某些方面与欧盟标准或价值观不相符的贸易伙伴，以期改变和规训其他国家在贸易或非贸易领域的一些做法。可是当前，欧盟贸易投资政策显著趋向地缘政治化，借由贸易力量改造他人已不再是欧盟的主要目标。在贸易谈判话语逐渐让位于经济战、贸易战修辞的时代，欧盟试图通过贸易来改变全球力量对比，运用经济手段参与公平竞争，以适应多边主义瓦解背景下碎片化的世界（Meunier, Nicolaidis, 2019）。

在地缘政治化战略统率下，经济体使用贸易政策工具的目的压过盟友，打倒对手，重塑全球力量对比体系。CETA 谈判过程中，欧盟与加拿大就是否将人权条款纳入贸易协定而争执不下。令人费解的是，此前欧盟一系列对外贸易协定都不曾将人权条款作为警戒线，甚至在与一些相较加拿大而言对“人权条款”不那么遵从的贸易伙伴交涉时，欧洲议会也不曾表现得如此强硬。Meissner & McKenzie (2019) 撰文指出，CETA 谈判中欧盟对“人权条款”的反复坚持属于组织战略行为，目的是标榜欧盟的人权捍卫者形象，以争取公众对该贸易协定的支持，同时以“人权条款”为筹码推动其他条件的讨价还价。加拿大虽为盟友，仍不妨碍欧盟出于自身战略目的向其开刀。

而在对待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时，多种迹象表明，欧盟已经不再积极地试图动用贸易手腕迫使中国做出改变，例如改善人权状况等。相反，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 2025”产业政策等布局，欧盟目前的动作更倾向于挑战中国继续作为负责任的多边体系利益相关者所必须解决的议题：欧盟仍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于近年来推行更为严格的外资审查制度。虽然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启动至今已逾 6 年，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准入问题谈判加速，未来也存在协商双边贸易协定的可能，但双方立场分歧仍然突出。在贸易政策服务于地缘政治战略的时代，可以确定的是，欧盟暂时还不会放弃对中国的干预与牵制。

受地缘政治化驱动，欧盟也在寻求新的同盟。特朗普上台后的对欧态度令欧盟深感不安，为平衡美国孤立主义对贸易的负面影响，欧盟将橄榄枝递往东南亚，与新加坡、越南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欧盟同墨西哥以及南方公开市场（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的谈判正在进行，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自贸谈判也已开启。此间欧盟的关键一着是推动达成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EPA 谈判历时 9 年，于 2018 年正式通过，协定于 2019 年生效。日欧 EPA 是迄今达成的全球最大双边贸易协定，形成了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覆盖 6.38 亿人、21 万亿美元 GDP，占全球经济总量近三成，贸易总量占全球总量近四成，将对欧盟、日本以及全球经贸产生重要影响（漆彤，窦云蔚，2018）。EPA 谈判前期日

理论探索

欧双方面临难以调和的分歧，但随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 TPP，地缘政治形势的紧迫推动 EPA 于 2017 年达成正式协定。为此日欧双方都做出了重大让步，例如欧盟就收敛了对规范性条款的推崇，并难得地将劳工权利、环境问题等事项与贸易关系脱钩。为了在太平洋地区打出制衡特朗普的王牌，欧盟贸易政策显而易见在为政治考量铺路。当前欧盟贸易政策政治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今后这方面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多。

4.全球疫情下的欧盟贸易政策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为遏制疫情蔓延，许多国家政府短暂叫停商业活动，关闭边境，限制人员流动。这些措施对于企业产出、家庭消费、投资和国际贸易都有很大影响。欧盟 5 月发布的第二份新冠疫情对欧盟贸易影响的报告（第一份于 4 月发布）（European Commission, 2020）显示，疫情将导致 2020 年全球贸易下降 10%-16%，预计欧盟 27 国商品和服务合计出口将减少 9%-15%，自非欧盟国家进口将减少 11%-14%。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按绝对值测算的欧盟 27 国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将减少 2820 亿至 4700 亿欧元，进口将减少 3130 亿至 3980 亿欧元。欧盟的大多数制造业出口将下降 15%，其中运输设备和电机出口受影响最大。

全球疫情之下，欧盟贸易该向何处去？政策制定者有不同观点。一批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Carl et al, 2020）在一封致欧委会现任主席冯德莱恩的联名信中声称，新冠疫情将导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后疫情时代的欧盟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美）的竞争中很可能处于劣势，除非立即采取一系列防御性政策保护内部市场，缓解贸易失衡，捍卫欧盟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如数字产业、5G 通讯、交通、医药，并维系欧盟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信中提议的举措包括大幅缩短反倾销与反补贴流程，尽快应用现有的保护性政策工具，抛弃耗时过长的法律程序，以及在必要时允许成员国自行采取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外部措施。

针对上述前任高级官员的意见，有学者撰文表示（O'Sullivan, Searles, 2020），这些保护性举动不仅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欧盟正常的贸易防御措施只针对进口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在欧盟 2014-2017 年度平均进口量中仅占不到 0.3%），而且不太可行（欧盟成员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管制出口，却无权自行采取贸易防御手段或限制进口）；更严重的，遵循此路线会有动摇欧盟贸易方针基本盘，背离自由贸易宗旨的危险。文章强调，须避免对国家安全概念的过分延伸，否则欧盟也会步美国的后尘。当然，这些高级官员不是唯一的保护主义提倡者，他们的发声其实也反映了欧盟的焦虑：疫情使各国重新审视全球供应链，全世界大部分医疗用品依赖于中国生产等现状引发了政策制定者的思考。典型代表是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Le Maire, 2020）。他在一次发言中强调“欧洲产业主权”、“合法防御”、

理论探索

“重整全球供应链”和“保护边境”。类似的观点在疫情白热化时期并不鲜见。

尽管疫情推动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坚持自由贸易、维护多边体系的主张依然占据优势。Orbie & De Ville (2020) 在一份报告中系统分析了疫情后欧盟贸易政策的走向。报告认为，现阶段诚然存在诸如回流关键战略性产业、实行国有化和重拾边境管控的呼声，但欧盟当前的贸易政策仍坚定不移维持新自由主义。无论是“驾驭全球化”或“管理全球化”策略还是保护主义或重商主义倾向都不曾撼动新自由主义的根基。整体看来，欧盟一直追求自由贸易，尤其近几年来体现在对 WTO 多边体系的捍卫以及与加拿大、日本、越南、新加坡等贸易伙伴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之中。新自由主义范式近乎固执地相信，更多的出口和更高程度的自由化方能带来增长，在这个前提下，全社会的安定繁荣方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迄今为止欧盟大体上始终贯彻这个信条。

那么，新冠疫情是否会导致欧盟贸易政策的转变？新自由主义有多大可能会向保护主义妥协？目前看来还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疫情的跨国界扩散、全球供应链的运转不灵即使暂时助长了孤立主义倾向，一味封闭与防御也不是长久之计。短期政策调整很难撼动根本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原因之一就在于新自由主义本身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再创新能力，其内容在动态演变中不断调整，适应新的形势。最典型的例子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欧盟贸易政策的新自由主义非但没有消亡，反倒愈发壮大。欧盟对外贸易政策话语也成功捍卫和发扬了自由化的优点，尽管话语风格随时势和语境变化表现出细微波动，但总体看来仍承袭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基因 (De Ville, Orbie, 2014)。对 2008 年危机进行解读时，欧盟委员会就将其诊断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属金融领域的危机，并进一步归咎于金融监管不足，投行不负责任行为和监督机构的失职。这样一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下属的贸易领域便免受责难。当时的欧委会还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反对自由贸易只会加重危机。更高程度的贸易自由化是欧洲和世界经济衰退的解药，对于欧洲和全球复苏将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De Ville, Orbie, 2011)。

由此观照今日，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遭遇全球疫情的强烈打击，欧盟贸易政策也不会轻易偏离其一贯的范式。虽说当前关键领域产业回流呼声很高，但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医用防护服，呼吸机和其他医疗用品。并且，针对保护主义观点，许多有识之士表达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欧盟前任贸易专员 Peter Mandelson (2020) 警告称，所谓“关键领域”不可解读得太过宽泛。他担心针对少数特定行业的回流会给其他行业带来压力，比如政策制定者日益强烈的国家安全忧虑最终可能导致许多部门不得不新增分工，造成生产制造链毫无必要的赘余。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 Bernd Lange 也表示 (2020)，欧盟将继续与其他贸易伙

理论探索

伴一道稳定 WTO 机制，捍卫多边体系。委员会目前也在积极推进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此外，Lange 提醒人们警惕疫情后民族主义的抬头，并指出产业链回流并非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欧盟要做的应当是将产业链现代化，而不是一味收归回来重复建造。他还关注全球产业链调整对生产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就业的影响，呼吁共同援助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凡此类似的表态说明欧盟贸易政策远未被保护主义浪潮所裹挟。本年度 G20 虚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贸易专员 Phil Hogan (2020) 明确表示，坚持开放贸易，避免对全球供应链不必要的扰乱是解决当前危机与推动后续复苏的关键。他提议各国取消一切进口限制，对防疫物资免征关税，推广“绿色通道”等。总的来看，当下欧盟政策制定者动作比较谨慎，在多个场合声援自由贸易的做法也表明了立场。

同时，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也在寻求出路。谈论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时，数字化和电子商务被多次提及。Bernd Lange (2020) 认为，生产过程数字化能大大缩短供应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电子商务连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给贫穷国家带来机会。目前，WTO 电子商务新规则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谈判结果对全球经济的意义不可小觑。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节点，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打造更新颖、更恰当、更有效的贸易形式。在电子商务全球化背景下，贸易理应越来越多地被视作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行为，而非局限于传统的国与国之间 (Smith, Dumiencki, 2020)。面对挑战，欧盟和世界都需要更激进的想法和更包容的心态，因为正是那些推陈出新的先进尝试有望定义未来贸易的方向。

四、结论

本文研究新时期欧盟贸易政策发展趋势，重点关注《里斯本条约》以来的政策演进特点。过去十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21 世纪第 3 个十年的肇始也因全球疫情而异常坎坷。互相依存的世界一旦有难，谁也无法幸免。这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也是全球化险阻重重的时代，欧盟贸易政策的调整、起伏、转舵乃至困顿都是时代脉搏的组成部分。

综观这个时期的欧盟贸易政策发展，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坚持自由贸易，推进全球化进程，捍卫多边贸易体系，整顿全球竞争规则。其中虽然有保护主义的横加干涉与政治化的兴风作浪，欧盟贸易的基本盘仍未动摇。所以，解读欧盟贸易政策趋势需要我们既看到富于变化的表象，又不为表象所迷失。

当下，全球疫情大事件正逐渐剥离欧盟政策话语的曲折修饰，不同意见派别的观点表达前所未有地直白。保护主义者和自由贸易者各执一词，欧盟贸易政策的新动向或许就将脱胎

理论探索

于这些不同主张的激烈碰撞。本文经过整理发现,尽管独善其身、自给自足的诱惑不可小觑,自由贸易的信念总归深入人心。不过,即使欧盟将基本盘贯彻到底,防御性行动和保守倾向也很可能出现。毕竟,正如本文反复强调的,重塑全球经贸秩序的诉求与地缘政治化战略的驱动都是相当强大的力量。综合多方面因素,采取多样化视角,我们对欧盟贸易政策的见解或许会更加全面和独到。

参考文献

1. Alasdair R. Young, "Two wrongs make a right? The politicization of trade policy and European trade strateg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6, No. 12, 2019, pp. 1883-1899.
2. Bruno Le Maire, *European industrial independence*, 2 April (2020), <https://www.gouvernement.fr/en/european-industrial-independence>, 访问日期: 2020年6月15日。
3. Ferdi De Ville and Jan Orbie, "The European Union's Trade Policy Response to the Crisis: Paradigm Lost or Reinforced,"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15, Article 2, 2011, <http://eiop.or.at/eiop/texte/2011-002a.htm>.
4. David O'Sullivan and James H. Searles, *Contrasting Thoughts on EU Trade Policy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19 May (2020), <https://www.steptoec.com/print/content/36057/Contrasting-Thoughts-on-EU-Trade-Policy-During-the-COVID-19-Crisis.pdf?q=>, 访问日期: 2020年6月14日。
5. European Commission, *Reflection Paper on Harnessing Globalisation*, 10 May (2017),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reflection-paper-globalisation_en.pdf, 访问日期: 2020年6月17日。
6. European Commission, *Trade for All: Towards a More Responsi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14 October (2017),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october/tradoc_153846.pdf, 访问日期: 2020年6月17日。
7. European Commission, *Concept Paper: WTO Modernisation*, 29 June (2018),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september/tradoc_157331.pdf, 访问日期: 2020年6月17日。
8.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Global and EU Trade*, 27 May (2020),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0/may/tradoc_158764.pdf, 访

问日期：2020年6月17日。

9. Ferdi De Ville and Jan Orbi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Neoliberal Trade Discourse Since the Crisis: Legitimizing Continuity through Subtle Discursive Chang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2014, pp. 149 - 167.
10. Francesco Duina, “Why the Excitement? Values, Identities,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U Trade Policy with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6, No. 12, 2019, pp. 1866-1882.
11. Katharina L. Meissner and Lachlan McKenzie, “The Paradox of Human Rights Conditionality in EU Trade Policy: When Strategic Interests Drive Policy Outcom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6, No. 9, 2019, pp. 1273-1291.
12. Editor Borderlex, *Lange: Spare a though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 post Corona trade world*, 16 April (2020), <https://borderlex.eu/2020/04/16/lange-spare-a-thought-for-developing-countries-in-a-post-corona-trade-world/>, 访问日期：2020年6月17日。
13. Michael Nienaber, *Tens Of Thousands Protest in Europe Against Atlantic Free Trade Deals*, 17 September (201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usa-ttip/tens-of-thousands-protest-in-europe-against-atlantic-free-trade-deals-idUSKCN11N0H6>, 访问日期：2020年6月9日。
14. Mogens Peter Carl, Riccardo Perissich, John Bruton et al, 12 May (2020), <https://www.politico.eu/wp-content/uploads/2020/05/LetterVDL12052020EN.pdf>, 访问日期：2020年6月14日。
15. Nicholas Ross Smith and Zbigniew Dumieniski, *Countries Should Resist the Protectionist Urge After COVID-19*, 22 April (2020),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0/04/22/countries-should-resist-the-protectionist-urge-after-covid-19/>, 访问日期：2020年6月15日。
16. Patrick Leblond and Crina Viju-Miljusevic, “EU Trade Polic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hange, Continuity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6, No. 12, 2019, pp. 1836-1846.
17. Phil Hogan, *Remarks by Commissioner Phil Hogan at G20 Virtual Ministerial*, 30 March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commissioners/2019-2024/hogan/announcements/remarks-commissioner-phil-hogan-g20-virtual-ministerial_en, 访问日期：2020年6月17

日。

18. Peter Mandelson, *Covid-19 and the global value chain model*, 9 April (2020), https://www.global-counsel.com/sites/default/files/2020-04/Covid-19%20and%20the%20global%20value%20chain%20model%20by%20PM%2009042020_0.pdf, 访问日期: 2020年6月16日。
19. Sophie Meunier and Kalypso Nicolaidis, "The Geopoliticization of European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7, 2019, pp.103-113.
20. Sophie Meunier and Rozalie Czesana, "From Back Rooms to the Street? A Research Agenda for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he Public Salience of Trade Policy-Making i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6, No.12, 2019, pp.1847-1865
21. 蒋小红:《贸易与人权的联结——试论欧盟对外贸易政策中的人权目标》,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第79-98页。
22. 牟岚:《欧盟贸易政策的发展趋势及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载《特区经济》,2014年第1期,第84-86页。
23. 漆彤等:《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新发展》,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3期,第74-86+158页。
24. 谭观福:《WTO改革的诸边协定模式探究》,载《现代管理科学》,2019年第6期,第76-78页。
25. 屠新泉等:《中欧BIT谈判投资自由化问题研究》,载《国际贸易》,2019年第9期,第48-54页。
26. 王宏禹等:《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欧盟贸易政策的张力及其表现》,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2期,第45-64+6页。
27. 王展鹏等:《欧盟在全球化中的角色——“管理全球化”与欧盟贸易政策的演变》,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1期,第77-97页。

第九章 重启全球化——埃及经济增长的新机遇

黄超⁶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世界，在疫情影响下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活动都遭到破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4.9%”⁷。如果新冠疫情在2020年内全年流行（情景2），全球经济预期增长率则下调1.5%，全球GVC出口附加值下降0.065%，全球出口贸易总份额下降0.34%⁸。2020年2月埃及出现了第一例新冠病例，由于埃及人口密度大、医疗机构接诊能力有限等原因，疫情较快蔓延。疫情下的停工停产和国际贸易活动受阻从内外对埃及经济造成双重冲击，影响了埃及的经济增长。

一、新冠疫情对埃及经济的影响

2020年第一、二季度埃及经济表现。从宏观经济数据看，2020年第一季度埃及GDP为15595亿埃磅（约合978.4亿美元），较上一季度增长了23%；第二季度GDP为15355亿埃磅（约合963.4亿美元），较上一季度出现1.5%的负增长。受到疫情波及，处于埃及“震中”的行业分别是制造业、运输与仓储业、旅游业、苏伊士运河收费、服务业、油气产业，据2019财年数据显示，上述行业全年GDP的贡献率约为41%，因此这些行业受到冲击必然导致第二季度GDP下滑。受到全球价值链断链和国内停工停产的影响，2020年1月起，埃及制造业指数不断下滑，从1月的121.9降至3月的108.8。从与民生相关的指数看，从2020年2月到4月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了1.6%，其中教育和娱乐行业涨幅最大。2020年第一季度失业率较上年第四季度有所下降，从8%降至7.7%。各行业工资均有所上升，其中信息和通信行业增幅最大。

综上，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埃及经济衰退，增长动力略显不足，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限，风险整体可控。分析各行业数据，4月以后随着全球经济重启，埃及部分行业（如海运等）逐渐恢复，另有新兴产业（如信息通信业等）将取代传统支柱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此外，疫情下埃及失业率小幅下降，CPI仍在合理区间运行，民生水平受疫情影响不大。因此，埃及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加之埃及政府目前在疫情期间采取的积极措施，埃及经济或随着全球疫情整体向好而逐步恢复。埃及规划与经济发展部长哈勒·赛义德此前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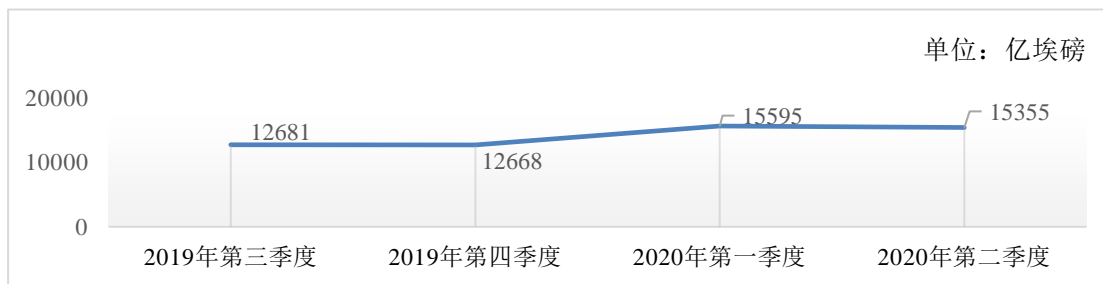
⁶ 黄超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阿拉伯国别区域研究、埃及经济改革与改革政策。（北京，100089）

⁷ 联合国货币经济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6月24日，<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0>，访问时间：2020年7月26日。

⁸ UNCTAD，“Global Investment Trend Monitor, No. 35”，27 March 2020，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iainf2020d3_en.pdf，访问日期：2020年7月26日。

示：“今年年底埃及经济增速将达到 4.2%，是世界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⁹

图 8-1 近四季度埃及 GDP 走势¹⁰



新冠疫情对埃及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新冠疫情主要通过破坏全球价值循环和阻碍人员流动这两种方式影响埃及经济发展。

制造业、油气产业、运输与仓储业的受挫可归因于全球价值链被破坏。据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五月统计数据》，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四个制造业领域为预支金属产业、饮料产业、印刷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业¹¹。埃及进口额前 10 名的产品品类中，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钢铁制品等，主要来源于中国、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¹²。上述国家均为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国家，且出口产品为埃及国内制造业所需的原料或中间产品，由于这些国家的封锁导致该产品的供应链中断，加之埃及国内停工停产，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停摆和各国封港导致苏伊士运河的集装箱运量受到累及，通过苏伊士运河的集装箱船运量同比下降 15%。此外，航空公司停航也导致了 5 月份闲置船队达到 11.6%，创历史新高。石油收入也是埃及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疫情下，一方面石油价格受到需求减少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远期合同价格的影响，国际油价持续下行。据 2019 财年统计数据，油气收入对 GDP 的贡献率为 10.6%，因此油价下跌对埃及造成了重创。

旅游业和服务业收入的减少可归因于人员流动受限。旅游业是埃及外汇收入的第三大产业，“2019 年埃及旅游收入为 130 亿美元”¹³，但疫情暴发后埃及旅游业已全面停滞，据埃

⁹ 英国广播公司，“埃及规划部长：埃及经济是世界增速最快的经济”，2020 年 4 月 27 日，<https://arabic.cnn.com/business/article/2020/04/27/egypt-coronavirus-economic-growth>，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25 日

¹⁰ 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2020 年五月统计数据》，2020 年 7 月，第 1 页。جهاز المركزي للتعبئة العام، (نشرة إحصائية شهرية مايو 2020)، يوليو عام 2020، ص

¹¹ 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2020 年五月统计数据》，2020 年 7 月，第 4 页。جهاز المركزي للتعبئة العام، (نشرة إحصائية شهرية مايو 2020)، يوليو عام 2020، ص

¹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埃及，2019 年，第 45 页，<http://eg.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905/20190502863308.shtml>，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26 日。

¹³ 萨拉·杰拉尔、安东·李德·图坦哈蒙、里哈姆·立法特·哈提布、米尔纳·阿提夫·奥多，新冠疫

理论探索

及规划部表示，2020 财年埃及旅游收入预计将减少 50 亿美元。劳务输出是埃及服贸出口的重要途径，侨汇是埃及第一大外汇来源。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 年在海湾国家务工的埃及人达 3068000 人，占埃及总移民人口的 82%，侨汇收入在 GDP 中的比例为 4.53%¹⁴。疫情期间近 1 万名埃及劳工由于停飞无法入境沙特，此外科威特政府此前试图遣返境内的埃及劳工，这些都使得埃及在海湾国家劳工人数下降，影响侨汇收入。

综上所述，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断和各国暂时关闭口岸导致的人员流动受限导致了埃及经济的暂时衰退。虽然埃及经济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很难通过一己之力复苏经济。从埃及的经济结构看，制造业、旅游和行业服务业、农业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其中制造业由于疫情下原材料和中间材料的工业链中断而间接受影响。农业方面，近年来埃及偏好种植园艺作物，用于出口创汇，而减少基础粮食种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出口具有相对优势的经济作物。但疫情使得全球供应链中断，不但经济作物出口受阻，此前削减基础粮食作物的外部性显现，还造成 600 万吨的粮食缺口¹⁵。旅游和行业服务业则受到疫情的直接影响。因此，重启全球化、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恢复才能使埃及经济复苏、增长。

二、重启全球化为埃及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埃及政府对本年度经济状况整体乐观，认为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年底经济增速可达 4.2%。为实现该目标，埃及中央银行制定并发布了《埃及中央银行限制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从振兴实体经济出发，《措施》重点提出了对旅游业、工业和农业的支持。但《措施》对全球经济形势提依赖度很高，而需要借助畅通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才能起效。

关于旅游业，《措施》第六条指出“对普通酒店和水上酒店、载客游轮翻新、装修的贷款总额从之前 50 亿埃镑上升至 500 亿埃镑，年利率 8%（递减法），最常贷款期限为 15 年。提供为期 2 年的其他优惠政策。允许在不超过 6 个月的期限内延迟支付工资、劳动报酬、购买必需品和旅游维护工作的费用……”¹⁶

情对阿拉伯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载《阿拉伯经济报道》，2020 年第 2 期，第 27 页。المستجد على الوطن العربي، عام 2020، ص 2 سارة الجزائر وأنطون رضا توت عنخ أمون حنا وريهام رفعت الخطيب وميرنا عاطف 2((النشرة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عربية))، العدد 2، عام 2020، ص 2، الأثار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لفيروس كورونا

¹⁴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指数，<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TRF.PWKR.DT.GD.ZS?locations=EG>，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26 日。

¹⁵ 萨拉·杰拉尔、安东·李德·图坦哈蒙、里哈姆·立法特·哈提布、米尔纳·阿提夫·奥多，新冠疫情对阿拉伯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载《阿拉伯经济报道》，2020 年第 2 期，第 37 页。المستجد على الوطن العربي، عام 2020، ص 2، سارة الجزائر وأنطون رضا توت عنخ أمون حنا وريهام رفعت الخطيب وميرنا 37بي، ((النشرة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عربية))، العدد 2، عام 2020، ص 2، عاطف عوض، الأثار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لفيروس كورونا.

¹⁶ 埃及中央银行，《埃及中央银行限制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措施》，2020 年 5 月 20 日，<https://www.is.gov.eg/Story/202615?lang=ar>，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26 日。2020 年 مايو عام 2020، ((إجراءات البنك المركزي المصري للحد من تأثير كورونا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理论探索

2019年埃及旅游收入创历史新高，达130亿美元，增长率达15.38%。政府对2020年旅游市场表现给予厚望，然而疫情限制了人员流动，埃及旅游业受到重创，埃及国家规划研究院题为《疫情对埃及旅游业影响》的研究指出，疫情将导致旅游业收入下降72.6%¹⁷。但尽管如此，国家仍将旅游业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利用酒店、游轮等旅游设施的空置期对其更新升级，以此迎接“后疫情时代”被压抑的旅游需求的释放，毕竟旅游业收入占埃及国家收入超过18%。然而，如果世界各国人为地给人员跨境流动设限，埃及旅游设施的更新和防护措施的加强无法真正有效地吸引游客。因此，埃及旅游业的未来还取决于“重启全球化”的速度与力度，跨境消费必须以各国口岸的畅通为前提。

从工农业角度看，《措施》第九条指出：“给予私营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提供年利率8%（递减法）、总额1000亿埃磅的贷款，用于资助私营工业部门和农业、制造业、农业加工行业的公司，其中包括年收入规模超过5000万埃磅的农产品出口、包装、冷冻站，鱼类、禽类、畜类公司。该措施旨在通过资助购买服务、生产必需品、机械设备、生产线等，已解决实际生产困难……”¹⁸

该项措施的提出证明埃及政府发现了工业和农机领域的短板。全球供应链中断对埃及工业生产造成的影响：疫情期间国内商品进口渠道减少，今年前4个月埃及进口商品额下降了24%，加之国内消费品无法自给自足，出现物价上涨的情况。此轮疫情直击埃及工业的短板，即无法形成产业链闭环，导致工业品供应受制于其他国家，在疫情及其他全球突发事件下工业品供应瘫痪。事实上，早在纳赛尔时期，埃及就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但萨达特时期起，由于开放政策导致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口到埃及，极大地挤占了国产幼稚产业生产同类商品的市场份额，埃及出现“去工业化”潮流，并长期处于初级工业化阶段。此外，埃及作为传统的中东农业大国，耕地面积也捉襟见肘，总在“种植经济作物创汇”和“种植基础作物保证粮食安全”两种选择间徘徊。虽然阿斯旺大坝的修建极大增加了埃及耕地面积，但大坝的作用仅限于使耕地水平扩张。而由于技术、设备等缺乏，耕地垂直扩张受制约，尼罗河峡谷的土地潜能一直没有等到释放。因此，央行的扶植政策实质是刺激埃及“重返工业化”道路，但路径则是历史上进口替代工业的老路，即先引进国外成套设备、转变、进口原材料和中间

0

¹⁷ 埃及国家规划研究院，《新冠疫情对埃及旅游业的消极影响》，2020年5月27日，<http://inplanning.gov.eg/ar/publications/Pages/Publications-List.aspx>，访问时间：2020年7月26日。معهد التخطيط القومي، (تداعيات أزمة فيروس كورونا على القطاع السياحي المصري)، 27 مايو عام 2020

¹⁸ 埃及中央银行，《埃及中央银行限制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措施》，2020年5月20日，<https://www.sis.gov.eg/Story/202615?lang=ar>، 访问时间：2020年7月26日。20، (إجراءات البنك المركزي المصري للحد من تأثير كورونا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مايو عام 2020

理论探索

产品，逐步将幼稚产业过渡到成熟产业。最终实现自主加工自造、自主生产中间产品，仅进口技术服务。鉴于进口对埃及重返工业化的关键性作用，全球供应链恢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逆全球化”不利于埃及工业的长足发展。

苏伊士运河的海运服务业也被认为是今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事实亦是如此。2020年1月，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发布干散货船和LPG运输船的通行费上调5%。但国际海事组织(IMO)的2020年硫排放上限推高了船用燃料成本，刺激更多船只选择较短的航线节约运输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涨价带来的通行量减少。就2020年前5个月来讲，苏伊士运河海运服务业运行良好，船只通过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其中散货船通过量同比增长42%，但集装箱船通过量有所下降。总体而言，苏伊士运河海运受疫情影响较小，第一季度收入增长2%。

早在塞西上任时，新任政府就对苏伊士运河给予厚望，“2013年政府斥资80亿美元修建运河的新航道。”¹⁹但此后油价下跌，油轮通过量减少，运河收入持续不佳。今年海事组织的硫排放量新规不但给当下的海运服务业注入了“强心剂”，还有望对未来苏伊士运河收入增长提供助推力。6月份政府“乘胜追击”，决定对从西北欧洲港口出发前往东南亚和远东港口的集装箱船的过河费和常规运输费用的6%，以此吸引那些绕行的船只重返运河航线。如果疫情对经济活动影响持续减弱，各国纷纷开放口岸、航班通航，船只通过量或将大大增加，实现拓宽运河航道时既定的目标。

由上述三方面实体经济振兴方略来看，其目标实现与否跟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关联密切。旅游业的发展有赖于各国协调对人员流动的管制政策，如航班、出境政策、回国隔离政策等。新一轮“工业改革”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更大，取决于全球供应链的恢复程度，如材料和设备进口国复工复产的规模与进度、交通运输服务的恢复程度等。而苏伊士运河收入更与世界经济复苏息息相关。综上，一方面埃及实体经济振兴方略极大程度受制于国际经济状况，是一个弱点。但是从另一方面证明，埃及在“逆全球化”辩论中站反方立场，在未来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并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

三、“后疫情时代”中埃合作激发埃及经济新动能

此次疫情对埃及人的生活和消费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零售业和教育行业数字化，对目前埃及的网络基础设施提出了要求与挑战。此外，疫情期间塞西总统致力于清除

¹⁹ Robert Springborg, Egypt,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8, p171.

理论探索

埃及城市的顽疾——违建，并承诺“给每位埃及公民一套住宅。”²⁰大规模的“破旧立新”促进了房地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埃及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疫情期间埃及对网络需求增加，要求提高。首先埃及具有巨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网络消费研究机构“we are social”指出，2019年埃及人网购食品和个人洗护用品的开销达6.07亿美元，电子设备开销达12亿美元，服装鞋帽开销达11亿美元。²¹疫情期间更多的埃及人选择在网上购物，据埃及最大的电商网站朱米亚（Jumia）表示，疫情期间线上销售量增长了50%。此外，教育部还积极展开网络教学，从幼儿园1年级到12年级的录播课程均通过教育部网站下载。教育部专门的教育与虚拟课堂平台已注册了130万教师和1350万学生。教育部努力确保9-12年级在网络直播授课，10至11年级的近1042万学生进行近110万场在线测验，题目总数超过2.5亿道。在网上组织12年级学生复习，为10-12年级学生提供LMS学习管理系统。在线上教育和线上线下结合教育与网购需求增加的刺激下，埃及网民数量增加，手机和电脑上网率达89%。2019年埃及通信与信息技术部曾投入300亿埃镑将埃及网速升级到30Mb/s，成为非洲网速第二快国家，今年为了满足远程教育和网购等网络服务需求，政府又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运营商支付2亿埃镑，为每户增加20%流量。

从埃及目前的网络状况看，网络能基本满足教学、购物、娱乐等需求，但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如在线教育无法保证全年级、全课程直播，网络无法全地区覆盖等。但目前依靠数字化平台办公、教学、购物的习惯以逐步养成，且“互联网+”模式已经成为埃及经济发展的潜在新模式，未来继续升级埃及的网络是大势所趋也是埃政府的必然选择。中国目前拥有成熟的4G网络技术和先进的5G网络技术，拥有很强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目前，中国的通讯公司，如华为、中兴等在埃均设有分公司，和埃及有很深厚的合作基础。如果能扩大、深化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一方面能有效转移我国优质产能，另一方面通过网络信息化升级，使埃及更能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从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看，它能拉动埃及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从建设结果看，更好的网络服务能保证未来埃及的“互联网+”模式愈发成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因此，中该领域的合作是优势互补的，也有利于激发埃及经济增长新动能。

²⁰ 英国广播公司，塞西承诺埃及人民：每个人都可以申领我们提供的住宅，但不允许城市盲目发展，2020年7月12日，<https://arabic.cnn.com/business/article/2020/07/12/sisi-every-citizen-needs-apartment-will-offer>，访问时间：2020年7月28日。سي أن أن، وعد من السيسي للمصريين: كل مواطن سيطلب شقة سنقد مها له.. ولن ننمو عشوائيا، 12 يوليو عام 2020،

²¹ We are social, *Readiness to engage in and benefit from e-commerce in Africa 2019*, 2020.6.14,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25563/e-commerce-readiness-in-africa-by-country/>，访问时间2020年7月28日。

理论探索

疫情期间塞西要求整顿违章建筑。其出发点除城市规划外，还有经济角度的考量。据统计“埃及 92%的房产主实际不掌握房屋产权。”²²这导致出现了一大批产权无效的建筑。所有者无法用这些房产做贷款的抵押或投资，也无法公开交易房屋。据估计，“在埃及这样的‘死资产’价值共计 2400 亿美元，相当于开罗证交所证券总值的 30 倍。”²³无效产权一方面导致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动员，资金被地产锁住。另一方面，它阻碍了利用这些房屋运营的中小型企业融资，因为死资产虽不能用于正规银行的贷款抵押。因此，“破旧立新”将盘活“死资产”，一方面通过房屋分配，使业主同时享有使用权和所有权，以激活房屋在融资中的抵押物作用，有利于激发埃及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私营部门活力；另一方面，也决绝了埃及人的住房问题，提高民生水平。

中国的建筑业也有很强的产能和丰富的经验与成熟的技术，而埃及在当下又有建设需求，因此中埃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广阔的前景。在疫情之下振兴房地产行业，一方面能够促进就业，因为建筑工程是劳动力密集型工程；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必然会带动其上、下游产业复苏，促进“后疫情时代”埃及经济振兴。

总而言之，房地产行业 and “互联网+”行业很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前提基础设施完备。但就目前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而言，难以快速完成建成并投入使用，动能释放缓慢，不利于加速经济复苏。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明显优势，而埃及拥有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消费市场。双边合作既能快速完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又能以此为契机，促进相关领域的中埃贸易往来。从结果看，合作打破了基础设施对埃及经济发展的制约，并带动当地就业；还能促进我国产能转移，使海外产能布局更加合理，更能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市场需求。

四、结语

2020 年 2 月新冠疫情在埃及出现并蔓延，对埃及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二季度 GDP 较第一季度出现了 1.5% 的负增长。疫情对民生水平影响不大：CPI 略上升，但整体在合理区间运行；第一季度失业率较去年第四进度有所下降。从行业指数看，苏伊士运河海运、建筑、网络服务等行业指数有所上升。因此，疫情对埃及经济的负面影响整体可控，经济有韧性、回旋余地大，疫情加速市场孕育新动能，“后疫情时代”埃及经济有望快速复苏。

为了抵御当下疫情对埃及经济的负面影响，埃及中央银行制定了一系列对策，在振兴实

²² Helmy, Empowering the People, *Al-Ahram Weekly*, September 3, 2004.

²³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6. P. 178.

理论探索

体经济方面，主要聚焦于制造业、农业制造业、旅游业。国际海事组织硫排放新政影响，苏伊士运河收入增加，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乘胜追击，降低部分航路船只过河费和运输费，以刺激收入增长。从应对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方略看，埃及将经济发展寄希望于逐渐重启的全球化，因为上述措施都是在全球化视域下制定的，也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有效地发挥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除了上述制度安排，疫情下埃及国内市场也孕育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即“互联网+”产业和房地产行业。它们或将成为短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然而新动能的激发要以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而埃及的基建能力尚不足以使新动能快速释放。因此，中国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强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和埃及展开该领域合作，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方式，共同激发埃及经济发展新动能。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埃及，2019年，第45页，<http://eg.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905/20190502863308.shtml>，访问时间：2020年7月26日。
2.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指数，<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TRF.PWKR.DT.GD.ZS?locations=EG>，访问时间：2020年7月26日。
3. 联合国货币经济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6月24日，<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0>，访问时间：2020年7月26日。
4. Helmy, Empowering the People, *Al-Ahram Weekly*, September 3, 2004.
5.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6. P.178.
6. Robert Springborg, *Egypt*,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8, p171.
7. 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 Monitor, No. 35”, 27 March 2020,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iainf2020d3_en.pdf，访问日期：2020年7月26日。
8. We are social, *Readiness to engage in and benefit from e-commerce in Africa 2019*, 2020.6.14,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25563/e-commerce-readiness-in-africa-by-country/>，访问时间2020年7月28日。
9. البنك المصري المركزي، ((إجراءات البنك المركزي المصري للحد من تأثير كورونا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20 مايو عام 2020،
埃及中央银行，《埃及中央银行限制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措施》，2020年5月20日，<https://www.sis.gov.eg/Story/202615?lang=ar>，访问时间：2020年7月26日。
10. جهاز المركزي للتعبئة العامة والإحصاء، ((نشرة إحصائية شهرية مايو 2020))، عام 2020.
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2020年五月统计数据》，2020年7月。
11. سارة الجزائر وأنطون رضا توت عنخ أمون حنا وريهام رفعت الخطيب وميرنا عاطف عوض، الآثار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لفيروس كورونا المستجد على الوطن العربي، ((النشرة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عربية))، العدد 4، عام 2020
萨拉·杰拉尔·安东·李德·图坦哈蒙·里哈姆·立法特·哈提布·米尔纳·阿提夫·奥多，新冠疫情对阿

理论探索

拉伯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载《阿拉伯经济报道》，2020年第2期

12. سي أن أن، وزيرة التخطيط في مصر: معدلات نمو الاقتصاد "من الأفضل عالمياً" رغم كورونا، 27 أبريل عام 2020،
英国广播公司，“埃及规划部长：埃及经济是世界增速最快的经济”，2020年4月27日，<https://arabic.cnn.com/business/article/2020/04/27/egypt-coronavirus-economic-growth>，访问时间：2020年7月25日。

13. سي أن أن، وزيرة التخطيط في مصر: معدلات نمو الاقتصاد "من الأفضل عالمياً" رغم كورونا، 27 أبريل عام 2020،
英国广播公司，“埃及规划部长：埃及经济是世界增速最快的经济”，2020年4月27日，<https://arabic.cnn.com/business/article/2020/04/27/egypt-coronavirus-economic-growth>，访问时间：2020年7月25日。

14. سي أن أن، وعد من السيسي للمصريين: كل مواطن سيطلب شقة سنقدمها له.. ولن ننمو عشوائياً، 12 يوليو عام 2020،
英国广播公司，塞西承诺埃及人民：每个人都可以申领我们提供的住宅，但不允许城市盲目发展，2020年7月12日，<https://arabic.cnn.com/business/article/2020/07/12/sisi-every-citizen-needs-apartment-will-offer>，访问时间：2020年7月28日。

15. معهد التخطيط القومي، (تداعيات أزمة فيروس كورونا على القطاع السياحي المصري)، 27 مايو عام 2020،
埃及国家规划研究院，《新冠疫情对埃及旅游业的消极影响》，2020年5月27日，<http://inplanning.gov.eg/ar/publications/Pages/Publications-List.aspx>，访问时间：2020年7月26日。

第十章 美国工厂——关于美国梦、中产阶级消亡和工会中的中美文化冲突

王东²⁴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美国电影学院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颁给了由史蒂文·博格纳尔和茱莉亚·赖克特执导的《美国工厂》。这不仅仅是一部忠实记录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们生产、生活、如何生存的影像，还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梦、社会分层、阶层固化、工会斗争等社会问题。由于影片拍摄的美国工厂是由中国企业福耀玻璃在美投资建立的，片中还直面了中美文化差异、价值观冲突等诸多问题，令人深思。

与《美国工厂》在北美的上映几乎同时，由三位美国学者厄尔·怀松、罗伯特·佩卢奇和大卫·赖特撰写的著作《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The New Class Society: Goodbye American Dream?*）的第四版于二〇一九年七月出了中文版。此书恰好可以揭示纪录片中隐含的深意，书与电影可谓相得益彰。

影片拍摄的“美国工厂”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代顿市（OHIO Dayton）。两任美国总统将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称为“锈带各州”，这些州内原本兴盛的汽车工厂纷纷关门，大量工人失业，厂房废弃，机械生锈，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顿——这些州也像生了锈一样。

一、关于美国梦

虽然工厂纷纷关门，但这并不能影响工人们继续做他们的美国梦，《美国工厂》里的一个工人说：“你永远不能放弃美国梦，对我们来说那就太没有美国范儿了，我能有自己的白色篱笆，我能有漂亮房子，如果孩子愿意，就让他们上大学，被人以礼相待。”

在《新阶级社会》一书中，作者总结了“二战”以后的美国梦的内容：拥有财务安全；拥有住房、家庭和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导致向上流动）；下一代有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幸福感（和前世代比）；成功的职业；自由、幸福且安逸的退休生活。影片中工人美国的美国梦与书中的定义基本吻合，但他们的美国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逐渐走向破灭。二〇〇八年美国通用汽车厂关闭了在代顿市的工厂，致使两千个家庭超过一万个工作岗位被裁减。美国工厂的关闭潮不仅缘于经济危机，还有美国全球化的新经济政策，它导致全美数百家公司将数千家工厂迁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减少了数百万美国工人的岗位。

²⁴ 王东，新疆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邮编：832003， e-mail: 304387213@qq.com
职称：副编审，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

理论探索

“二战”后制造业在美国就业岗位中的比重曾达到 40% 的峰值，在此期间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中产阶级家庭。但七十年代以后这个比重逐渐下降，一九八一年滑落至 27%，在二〇一〇年降至 8.1%，一九七九年至二〇一二年间有八百万个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甚至更年轻的美国人也了解，二〇〇五年至二〇一二年间，美国失去了二百四十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也正是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竞选总统时极力鼓吹的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竞选口号，从而唤醒了广大蓝领阶层重回中产阶级的美国梦，为其赢得大选助力。

在汽车制造业，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外国厂商夺走。在此期间，美国总统和国会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加入工会的美国汽车工人免受外国竞争方面却做的很少，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旗帜下，外国厂商首先被允许其出口产品无限地进入美国汽车市场，然后被鼓励在美国建厂，在那里与非工会工人一起生产汽车。于是大量的日本汽车企业涌入美国，影片《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们就是代顿市原通用汽车厂二〇〇八年倒闭时的失业工人。二〇一〇年中国公司开始增加在美国制造业的投资，重启美国关闭的工厂，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于二〇一四年开始进入美国的。

二、关于中产阶级消亡

《美国工厂》里的 Jill 想挣扎着再次回到中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就是美国普罗大众的美国梦，Jill 曾经是前通用汽车工厂里的一名叉车操作员，她当时的年收入也确实迈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但通用汽车关门时，她的房屋抵押赎回权被取消，不得不寄居在她姐姐家的地下室里，生活陷入困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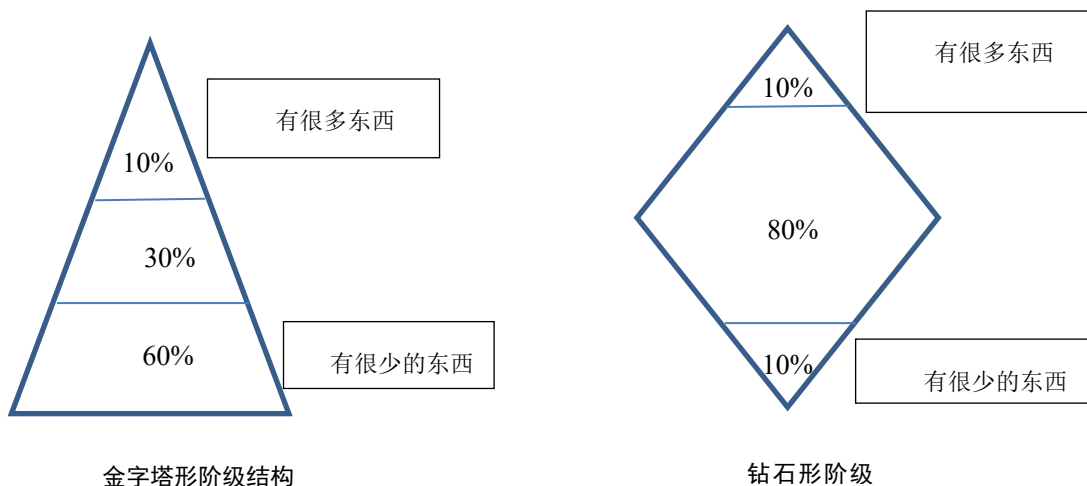
《新阶级社会》的作者通过三种方法来界定中产阶级，分别是：收入方法、资源方法、机会方法。其中就收入要素而言，作者将中产阶级年收入界定为每个个体劳动者或家庭三万至十万美元。就资源要素来说，作者将具有以下条件的劳动者（及其家庭）定义为中产阶级：稳定的工作任期；全面的、低成本的医疗保险；享有实质性的、有保障的、“固定收益”养老金。关于机会，作者把“机会”界定为广大中产阶级成员都有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现实机会，其条件是社会具有三个结构性特征：存在着大量入门级的工作岗位，给劳动者提供“中产阶级”水平的收入和资源；在“中产阶级”或更高收入和资源水平上，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大量和容易获得的需要本科学位的职位；对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甚至更低）而言，只要达到相应的条件，就能在更高的阶级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

仅就收入要素这一点来说，《美国工厂》里的 Shawnea 在通用汽车厂工作时，能够拿到每小时二十九美元的薪酬，这样按照一年工作两千小时来计算，她的年收入可以达到五万八

理论探索

千美元，超过了三万美元的下限，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但随着通用汽车转移海外，Shawnea 不得不失业待在家里，生活一落千丈，而当福耀玻璃在代顿招工，她应聘成为厂里的一名玻璃检查员，福耀给她开的时薪不到十三美元，这样她的年收入就低于年收入三万美元的下限。她现在没房、没车，甚至为孩子买运动鞋时也会捉襟见肘。

事实上，福耀美国工厂（当然也包括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在美工厂）里的工人属于美国的“新工人阶级”，他们也被称为“不稳定就业阶级”或者“受排斥阶级”，他们从事的工作可能在没有任何通知下被终止，即使他们看起来有了全职工作，即使他们的工资高于每小时 7.25 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但他们依然被看作“有工作的穷人”，他们在短期内为工资而工作，但很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长期失业，那时他们就得靠失业补偿金、食品券（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福利或伤残抚恤金生活。受排斥阶级还包括收入非常低的退休人员，他们试图以低薪兼职和临时工来补贴退休收入。



《新阶级社会》介绍了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历程，美国的阶级结构在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五年间类似于上面的金字塔形结构，在“二战”之前的十年，美国经历了漫长、深刻和影响广泛的大萧条时期，大部分美国人被固化在社会底层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金字塔结构中顶层家庭的平均收入和底层家庭的平均收入的比值非常大，达到 400:1 或者更高，而且这三层之间被区隔开来，向上流动非常有限。

本来上述金字塔中的每一层中最新出生的一代可能会终生留在那里，这一切在美国参战后发生了改变，“二战”导致工业复苏，“二战”结束时美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和军事第一强国，马歇尔计划也保证了美国成为世界商品和服务的主要出口国。许多退伍军人被重新吸收到劳动队伍中，这些受过教育和拥有技能的新劳动力是美国经济复兴的新兴力量。此外，还有较为良性的劳资关系，这一切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积极利益，到了五六十年代之后，美国的战后经济重塑了美国的阶级结构，使其从金字塔型演变为钻石型。工人年收入的中位数从一

理论探索

九五九年的 37940 美元上升到一九七三年的 45748 美元，增长了 22%。这产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80%的美国人），而且人们还有足够的机会进入到这个中间群体，这是中产阶级的黄金时期，也是美国梦的兴盛时期。

对于美国的阶级分析不论从以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生产模型还是以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功能主义模型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但这二者均未能预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新经济”的历史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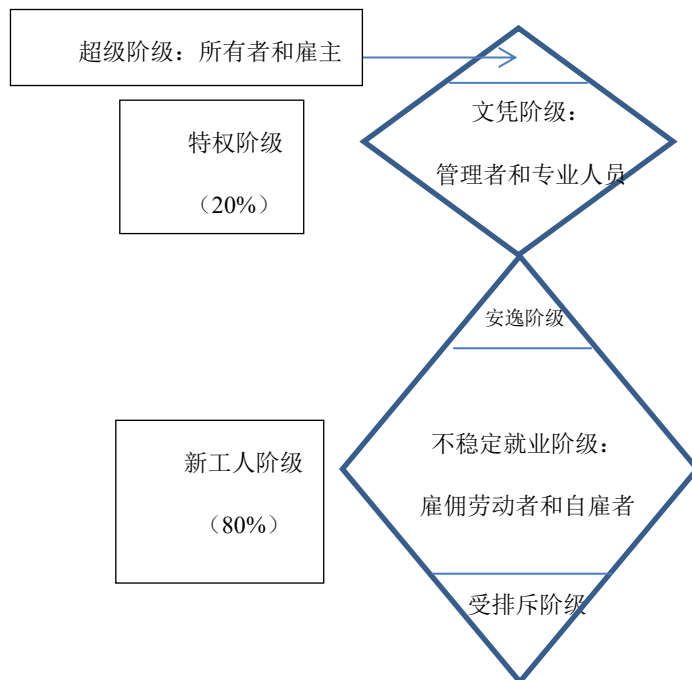
当遭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和亚洲国家重新开始生产商品并且成为美国的竞争者时，七十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经济开始出现增长放缓。美国在一九七七年贸易逆差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三位数（二百九十二亿美元），美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很多美国大公司利润下滑。公司高管、政府领导人都在讨论全球竞争和利润下滑。但公司领导人并没有通过投资更有效的技术或新产品革新以应对汽车、钢铁、纺织和电子产品市场不断加剧的竞争，而是在两党的帮助下，着手推动一个为期四十年的改变：扩大对外投资、兼并，与外国公司联营，通过关闭工厂、裁员实现外包和离岸外包国内产品。四十年间，美国最大、最知名的公司关闭工厂、转移投资到海外、裁员和外包，猛烈侵蚀着曾经是美国“中产阶级”支柱的高薪职业。在中产阶级消失的同时，一大批新的高薪企业主、公司高管、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生逢其时，形成了一个拥有高福利和政治权力的大型主导性特权阶级。

《新阶级社会》的作者在生产模型和功能主义模型之后又提出了分配模型来解释这些新的事实。在这个新模型中，作者保留了原生产模型对职业的关注，同时增加了组织及其控制的分配过程，如雇佣工人的组织提供工资，还可能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政府组织制定贸易政策，设置个人和公司税率，并界定劳资权利和责任。教育组织（如大学）为毕业生提供在劳动力市场使用的专业技能文凭。作者认为将职业结构（生产模型）和有组织的成员身份（分配模型）地位结合起来，可以确定阶级身份，解释分层体系，同时考虑阶级不平等的后果。

在这个分配模型中有四个特点：第一，正在出现的新阶级体系是有组织基础的。职业固然重要，但个体所效力的组织更具有引领性。一个律师，如果他效力于薪酬极高的大律师事务所，那么他可能是特权阶级中的一员，而他若在小城镇处理离婚、遗嘱和刑事案，那么他可能属于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在以前的生产模型里，他只属于同一阶级。第二，把阶级定义为拥有投资资本、消费资本、技能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个体与家庭的集合，这四种资本也被称为“生成性资本”。因此，作者把阶级结构视为主要由组织控制的资本分配形式所形成，个人和群体持有资本数量的多少，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地位。第三个特点涉及一种理念，即大型

理论探索

组织集中参与了分配过程的合法化，以及该过程产生的阶级不平等。而且大型组织还创建信仰和解释来证明以上四种资本的分配是正当的。最后一个特点，即由阶级不平等导致的两大阶级划分，使得美国的阶级结构逐渐两极化。新阶级体系更接近于阶级结构中的双钻石型。



双钻石形阶级结构和阶级组成部

在这个双钻石型结构中，决定阶级地位的不是职业，而是生成性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旧稳定、安全的资源——决定了阶级地位，这些资源由特定职业所在的组织提供。《美国工厂》里的工人就处于这个双钻型结构的下层，他们属于不稳定就业阶级或者受排斥阶级。决定他们阶级地位的是福耀玻璃、丰田汽车等大型组织。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作者发现两个趋势，一是收缩的中产阶级，收入不断集中在富人手中，底层阶级规模扩张；二是对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美国产生了严重的阶级两极化和阶级固化。自一九七三年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物质福利无法逆转地下降了。作者在追溯不平等趋势的增加和相关数据时，并没有发现有急剧的转折点，相反，这是一个长期、缓慢、逐渐持续向下的过程。这种过程就像在一个肌体上大量地用小刀切割伤口，每一刀看起来没什么影响，但加起来，成千的伤口渗出生命之血，作者用了“千刀万剐”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

而对于中产阶级消亡、阶级固化、阶级两极化形成的原因，作者则用冰山来形容，人们往往只看到表象，而在水面之下的巨大冰山，也就是阶级分析，属于禁忌的部分，即使在美国，这类分析也是危险的，超级阶级和他们的文凭阶级盟友、保守主义势力、中右翼智库、

理论探索

超级阶级控制的媒体，都不愿意过多涉及这个话题甚至加以掩盖。所以，大多数美国人不太了解美国阶级体系的结构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许多美国人仍然把自己看作是“准富人阶级的成员”。就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从未在美国扎根，因为穷人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暂时困窘的百万富翁。”虽然作者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但从全书来看，他们无疑是偏左的，他们一直在揭示阶级问题，一直在为底层、工会发声，他们通过追踪超级阶级主导性组织的策略和活动，揭示了这个阶级如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主导组织、公共政策、计划、思想和社会行为。超级阶级权力网如何通过主导性权力网络影响选举和管理倾向于有利于它们的政策和法规，以及如何影响与工作、自我实现、大规模消费和闲暇时间的使用等有关价值观和信仰方面的生产及分配。在这些过程中，美国梦被阶级不平等的巨大冰山所背叛和摧毁了。

但是，即使作者带有左翼的政治态度，在如何解决中产阶级消亡，如何消除两极分化、阶级固化等问题上，作者并没有祭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作者赞同和支持所谓结构性民主的方案：恢复政治和政府的真正民主参与；将民主管理的原则扩展到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公司结构中；扩大所有公民参与民主进程的机会；提高美国人的阶级意识，更重要的是，还要更深入了解阶级结构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是怎样被组织、加强和延续的。作者从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参与到新的社会变革行动中，这对于高度不平等的新阶级体系中迫切需要的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

三、工会中的中美文化冲突

在电影《美国工厂》中，对于正在消亡的中产阶级、现在的不稳定就业阶级及受排斥阶级，导演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观察，那就是工会。

吸引日本企业和曹德旺的福耀进入美国的，有锈带各州政府为吸引外资提供的“一揽子激励”优惠，福耀玻璃进入美国时当然也享受到了这些激励政策，曹德旺也曾多次公开表示，莫瑞恩工厂 18 万平方米的建设费用大概是 4000 万美元，得到的政府补贴就超过了这一金额。而福耀在美国投资建厂并取得成功还取决于自身行业的特殊性，由于福耀玻璃主要生产汽车玻璃，而玻璃的运输难度大、成本高，必须围绕整车企业就近建厂，而福耀在 2011 年拿下通用汽车这个客户，供应海外客户，打入美国本土势在必行。另外，曹德旺称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正在上涨，加之运输成本和税收等相对较高，在美国设厂的成本其实比中国高不了多少。曹德旺还说，他做汽车玻璃要用浮法玻璃，做浮法玻璃要用天然气，美国天然气的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电价是中国的 70%。在其他场合的采访中，曹德旺还说过，在俄亥

理论探索

俄州的工厂，每招收一个美国工人，就会得到一定的税收补贴，当时已经招到的 2000 多员工最起码会得到 3000 万美元补贴；此外，2016 年还拿到了 70 万美元的培训补贴。他说：“即使是为工厂换节能灯，当地政府也会给补贴。”

俄亥俄州对于外资在美建厂所给予的投资成本上的优惠当然是激励曹德旺在代顿建厂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决定他们建厂成败的重要因素就是工会。资方与工会的冲突在《美国工厂》这部影片中是矛盾的高潮，是中美文化冲突的核心之一，也是影片最为精彩的部分。而在《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一书中，工会虽然没有被列为单独的章节来阐述，但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探讨却贯穿于全书之中。

福耀美国建厂伊始，就面临着工厂里是否要建立工会组织，对此，曹德旺明确表态：“不希望工会在这里发展，因为工会会影响到我们的劳动效率，影响我们的企业效益。……美国工人效率低，产出低，不能管，一管他说我要去找工会了。”而在 2016 年 10 月 7 日福耀美国代顿项目竣工庆典上，俄亥俄州议员在发表讲话时对福耀美国工厂的建立不吝赞美，但在随后的讲话中却希望在工厂成立工会，为此，深知曹德旺本意的福耀美国的副总裁 Dave（美国人）非常恼火，甚至说“我要杀了这个议员”。随着工厂开工，由于中美员工在管理、生产和文化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越来越多，美国汽车工会在工厂外的游说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上文中曾提到过叉车操作员 Jill 也积极投身于游说工人们建立工会的活动中。在代顿当地 UAW（汽车工会）的 696 号大厅里，部分参加活动的福耀美国工厂里的工人纷纷吐槽：一个同事被炒，原因是住院一周而未请假；一个工人坐着的纸箱着火了，其他人仍继续工作。在其他场合，美国工人说，中国工人将化学废液直接倒入下水道，那样会污染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另一个美国工人抱怨说，中国人只是站在他旁边监督，让他加快速度，却从不鼓励他，他们不把美国工人当人看。俄亥俄州一个议员在汽车工会 696 号大厅里说穷人的生活由富人来决定，这不公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并鼓动工人们要改写规则。

最终，在由 1500 多名福耀美国工厂的工人选择要不要成立工会的投票中，反对成立工会的工人以 868 票对 444 票获胜，工会没有成立。曹德旺、他的管理层和福耀美国里的中国工人都长长舒了一口气。看结果好像美国工人中喜欢工会的人也不多，影片中确实有美国工人表达了对工会的不满，有一个工人就认为工会只会留下烂员工，福耀提供很好的福利待遇，靠付工会会费却得不到。中国工人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有了工会，那些工作散漫、速度慢、效率低下的工人就有了依靠，即使他们生产效率不高，工厂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然而这仅仅代表了一部分中美工人的看法。在投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福耀美国向 LRI（劳资关系研究所）这样的公关公司支付了 100 万美元的费用来对抗工会，LRI 每天轮流召集福耀美国工

理论探索

厂的工人去开会，向他们晓以利害，加上曹德旺也曾明确表态，如果工厂成立了工会，那他就不在美国继续建厂。在面包和人权之间，最终大部分美国工人投票反对成立工会。而向 LRI 这样的反工会咨询业在全美稳步发展，与此同时是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和工会会员却随之减少。美国工会会员的比例从 1973 年的 24% 下降到 2012 年的 11.3%，是 80 年来的最低点，在私营部门的工人中只有 6.6% 的工人加入了工会。而《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确认了一些最近的研究成果，强大的工会“有助于道德经济，其使公平薪酬的规范制度化，甚至包括非工会工人。”即使该书的三位作者——美国大学里的教授，也很可能是工资与福利模式的受益者，在过去，这一模式凭借道德经济从高度工会化的工作场所传播到大学。但随着工会的衰落，大学教师的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也在下滑，这并非巧合。工会成员的减少和强大工会支撑下的道德经济模式的消逝，都导致非标准化工作岗位的增加，包括兼职、临时工、合同工。所以在没有工会支撑的福耀美国的工人，每小时获得的薪酬是 12.84 美元，即使后来又涨了两美元，依然属于低薪的行列。仅收入这一项判定，他们已经不在中产阶级行列了。而且叉车员 Jill 由于支持工会，也被福耀美国直接解雇。工会一方面在与资方对抗中确保工人的利益，同时又成为另一些工人眼中的懒人保护所。

《美国工厂》之所以能够获奖，还在于影片视角和曹德旺的开放性，它的镜头不仅仅只盯在美国工厂里的美国工人，还将延伸到了福耀公司总部——中国福建福清的福耀工厂，在那里，中国工人的工作状态也被展现无疑。影片中的中国工人说他们一个月只休息一到两天，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就这样有的工人还不愿意，想有更长的工作时间，工人们一年之中只有过年才回家乡，平时很少放假，工作确实累，但也没办法，他们听领导的，一年只回家一两次。影片并未告诉观众中国工人的工资是多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耀美国的美国工人一周休两天，一天工作 8 小时，日薪 100 美元，不加班，节假日正常休息。即使这样，在度过福耀美国初建时的蜜月以后，以中老年、妇女、少数族裔为主的福耀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仍然抱怨工作太累，强度太大，节奏太快。所以国内有关《美国工厂》这部影片的文章下面评论区的留言里，中国网民几乎一边倒的批判美国工会只会保护懒散的工人，导致美国工厂缺乏竞争力，影片中的中国工人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中国人对工会在保障工人权利方面做出肯定。而美国工人即使知道工会能为他们争取权益，但在面包与人权之间，工人也不得不放弃工会，即使资方给他们很低的工资，也只能接受。毕竟，这总比失业强。

影片中最有意思的是福耀美国的管理层来中国福耀总部参观学习，导演将镜头也对准了福清福耀总部的工会，福耀虽然是民企，但也有工会，福耀玻璃的工会主席，也是福耀党委书记、曹德旺的妹夫何世猛在影片中对采访者说：“工会跟企业，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理论探索

是跟齿轮一样转动，都把他（工会）拉入，都为福耀，因为我们是在这艘船上，船好，大家才会好，船开翻了，大家连饭碗都没了。”中国文化传统里实用理性的生存哲学在工会这个组织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工会与资方从来不是对立双方中的一员，生存权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一前提下，其他更高级别的权利都可以放弃。这就造成了中美在工会问题上最大的不同，中国工人即使低薪也要加班加点，同时任劳任怨，他们都很听话，即使为了工作放弃家庭也在所不惜，在中国这些会被认为是美德，但美国人看来就是缺乏对人权的尊重。美国人在这里看到的是不平等、不尊重，而且看不到爱，这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而美国工人只上 8 小时班，其他时间钓鱼、养马、烧烤，资方不能强迫他们加班，他们认为除了工作还要有惬意的生活。在影片中，由于招不到太多年轻人，工厂里的中老年工人动作慢，效率低，但这也不能成为轻易解雇他们的理由，反而他们要求有起码的尊重与保障。而这在中国人眼里，被看成是造成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工人，当然不值得尊重，不能养着他们，该炒鱿鱼就炒。没有工会的超大组织就有这样决定工人命运的生杀大权，即使管理层也不能幸免，福耀美国副总裁 Dave 就是最好的例证，2016 年的竣工典礼上，他曾气愤地说要杀了那个嚷嚷着要建立工会的州议员，但由于福耀美国早期的亏损，他和总裁一起被炒，福耀美国的总裁最终还是换成了中国人刘道川。导演并没有忘记 Dave，Dave 在影片中说：“没想到，现在没有人能为我（被炒）说话了。”

文化就像花，就像果实，什么样的土壤中长出什么样的树，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移花接木处处皆是，但是接过来的木能否服当地的水土？只有自己知道。

四、尾声

二〇一六年度，福耀美国亏损超过 2.7 亿元人民币，这也是中式管理水土不服、美国员工不满福利待遇等冲突集中爆发的时期。这种亏损一直延续到二〇一七年上半年，但在下半年迅速扭亏为盈，全年实现营业收入达到 21.48 亿元，净利润为 508.23 万元，到 2018 年，福耀美国项目渐入佳境，营收增长到 34.12 亿元，净利润达到 2.46 亿元，这也反映了企业内部弥合分歧的作用。但现在福耀美国的工人起薪仍是每小时十四美元，雇有两千三百名美国工人和二百多名中国工人，不过这些美国工人仍未达到三万美元年收入的中产阶级下限。

作为曾经的中产阶级的一员——福耀美国的前员工 Rob 坐在自家门前的廊檐下，看着自己的庭院，看着自己的马。一年前，他与中国员工小王和一群中国同事在自家烧烤，Rob 教他们用步枪射击，大家玩得很开心，他与小王在工作中也结成好友；如今，他因为电脑操

理论探索

作太慢而被福耀美国解雇,堕入社会底层的他还能否负担得起这么大的庭院?一大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他心中的美国梦已经破灭了吗?他理想中的生活能再次回到眼前吗?影片并未给出答案,这也给观影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参考书目:

1.[美]厄尔·怀松、罗伯特·佩卢奇、大卫·赖特著,张海东等译.《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第四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参考文献:

1. Robert Borosage and Katrina Vanden Heuvel, "The American Dream: Can a Movement Save It?" *Nation*(October 10, 2011):11.
2. Richerd Henderson,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Output Projections to 2020," *Monthly Labor Review*(January 2012):66.
3.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Databases, Table & Calculators by Subjet, "Industry: Manufacturing," November 11, 2012, on the Internet at <http://data.bls.gov/timeseries> (accessed November 11, 2012).
4.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Databases, Table & Calculators by Subjet, "Industry: Manufacturing,"
5. Robert Perrucci, *Japanese Auto Transplants in the Heartland: Corporatism and Community* (Hawthorne, NY : Aldine de Gruyer, 1994).
6. [美]厄尔·怀松, 罗伯特·佩卢奇, 大卫·赖特著, 张海东等译.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 (第四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43.
7. [美]厄尔·怀松, 罗伯特·佩卢奇, 大卫·赖特著, 张海东等译.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 (第四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77.
8. Jon Meacham, "Keep the Dream Alive," *Time* (July 2, 2012):29; Pew Reaserch Center, "Inside the Middle Class:Bad Times Hit the Good Life," *A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 Report* (April 9, 2008),10,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ewresearch.org> (accessed February24, 2012).
9. Gottschalk, *The Shadow Welfare State*.
10. Marger, *Social Inequality*, 5th ed.,117-119.
11. U. 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2*, 367.

理论探索

12. [美]厄尔·怀松, 罗伯特·佩卢奇, 大卫·赖特著, 张海东等译.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 (第四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35.
13. [美]厄尔·怀松, 罗伯特·佩卢奇, 大卫·赖特著, 张海东等译.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 (第四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14.
14. [美]厄尔·怀松, 罗伯特·佩卢奇, 大卫·赖特著, 张海东等译.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 (第四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81.
15. U. 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1995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95) , 814.
16. Lawrence Mishel, Jared Bernstein, and Sylvia Allegretto,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 2004/200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96.
17. Robert Perrucci and Carolyn C. Perrucci, America at Risk. The Crisis of Hope , Trust, and Caring (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2009), 18.
18. [美]厄尔·怀松, 罗伯特·佩卢奇, 大卫·赖特著, 张海东等译.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 (第四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21.
19. [美]厄尔·怀松, 罗伯特·佩卢奇, 大卫·赖特著, 张海东等译.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 (第四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22.
20. [美]厄尔·怀松, 罗伯特·佩卢奇, 大卫·赖特著, 张海东等译.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 (第四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101